趙紫宸的宗教經驗 *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

一．前言

宗教經驗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說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實在很難想像信徒的宗教世界裡只有教義（或理論）而沒有經驗。[1]事實上，皈依（conversion）本身，便是重要的宗教經驗，肇始了個人與「宗教真實」（religious realities）間的關係。[2]同樣，宗教經驗在基督教神學建構與反省過程中的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爲神學意味著對宗教信仰的參與，而這種對信仰生活的經驗自然地會先於神學，或是導引了神學的建構。[3]

扼要而言，宗教經驗包括狹義及廣義兩個層面，前者指一種特別的，很多時候是頗戲劇化甚至是奇特的神秘經驗（mystical experience），後者則指人以宗教方法對自身的生命、信仰生活及傳統所作的整合與反省的經驗。[4]不同人對於神秘的宗教經驗，有著迥異的立場，熱切（甚至盲目）追求者有之，抗拒者亦有之。也有人持平看待神秘經驗，試圖平衡地處理經驗與理解間的關係。我們亦得留意，狹義及廣義的宗教經驗之間，也可以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神秘經驗既能豐富或深化信仰經驗的體會及反省，亦有促成兩者緊張關係的可能。同時，廣義宗教經驗也能制約或指導對神秘經驗的詮釋。這些不同的關係，在在形塑了信徒宗教世界的活力與張力。

趙紫宸（1888-1979）是舉世知名的中國神學家，著作等身，先後出版專書三十多種，發表的中英文論文更是不計其數。他曾任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普世基督教協會主席，對中國本色神學建構及神學教育發展，作出了許多深入的反省。其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基督教的影響及貢獻，至今一直爲學者所關注，迄今已有數本論著討論其神學

---

*本文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東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提供部分資助，作爲「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研究計畫的成果。初稿完成後，曾於「趙紫宸宗教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燕京研究院及清華大學哲學系合辦，2004 年 4 月 21-22 日，北京）宣讀，後刊於燕京研究院及清華大學道德與宗教研究中心編：《趙紫宸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初稿修訂後，於「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學術研究會（2004 年 10 月 23-24 日，武漢）發表，並收於劉家峰編：《離異與融合：中國基督徒與本色教會的興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題目易爲〈尋找真實的信仰：趙紫宸的宗教經驗〉。上述兩個版本異有出入，同時於國內出版時亦被刪去部分內容，現爲最詳盡版本。

[1] 詹姆斯（William James）甚至強調，構成宗教生活的骨幹並不是宗教教義，而是宗教經驗。參詹姆斯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台北：立緒文化，2001）。

[2] 詹姆斯著，蔡怡佳、劉宏信譯：《宗教經驗之種種》，頁 235。

[3] 麥奎利（John Macquarrie）在《基督教神學原理》（***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一書中，處理神學的六大素材時，首要便是經驗（其他是啓示、聖經、傳統、文化及理性）。參 John Macquarrie,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77), 4.

衛理宗神學高舉的「四大支柱」（Wesleyan Quadrilateral）是：聖經、理性、傳統及經驗。參 Randy L. Maddox, ***Responsible Grace: John Wesley's Practical Theology*** (Nashville: Kingswood Books, 1994), 36-46.

[4] 楊牧谷主編：《當代神學辭典》，下冊（台北：校園書房，1997），頁 981。

思想。[5]

綜觀中外學者對趙紫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整理及探討其神學思想，對於趙氏個人的宗教經驗，以及經驗與神學建構間的關係，仍是個有待開墾的空白領域。本文以趙氏的宗教經驗爲主題，旨在探討不同階段趙紫宸在宗教經驗方面的特色及其演變的關鍵。筆者相信，如果無法重構基督教神學家的內在宗教經驗，我們實難以管窺其神學思想的全貌，更遑論掌握其流變的關鍵。職是之故，有關領域的疏理，不僅可以藉此展現這位舉足輕重的中國神學家的內心世界，也爲我們解讀其神學思想，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視野及背景。

二．宗教的平安與不平安

「牛鬼與蛇神，使我心膽寒」[6]

趙紫宸在接觸基督教前的宗教世界，可說是深受民間信仰的傳統影響的。

一八八八年二月十四日（清光緒十四年正月初三日），趙紫宸生於浙江德清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趙紫宸家裡的長輩，都是滲雜著儒釋道的民間信仰的忠實信眾。每逢神佛誕日，或其他祭祀戲文，趙父（炳生）便帶同家人前往參拜。趙的童年，基本上都在這些傳統儀式中度過，對他產生很大的影響，難怪他日後形容自己「自幼便與鬼神接近」。

民間信仰的鬼神觀給趙紫宸的深刻影響，莫過於令他產生強烈的恐懼感。趙氏自幼體弱，家人也常帶其「求僊（仙）拜佛」，參神許願，甚至服用「僊方」。在他七歲那年，嬸母病逝，家人延請僧道來追薦亡魂。儀式進行中，家裡懸掛著佛像及十殿地獄等畫軸，把年幼的趙吸引著，仔細觀看。「瞧過之後，便覺得滿屋都是鬼了」。此後，他便動輒得懼，舉凡風吹草動，悉疑爲鬼，甚至幻覺看見凶鬼。半夜又恐鬼魅壓身，或見惡鬼立於床前。

不過，在驚恐的同時，趙與民間神祇間又有著某種親切的宗教經驗。九歲那年，[7]趙母患上極重的傷寒，家人求神拜佛，買籤問卜，全無果效。後來有親人介紹一位胡姓的巫醫，來家裡作法，爲病人戰勝邪鬼。趙仍記得跪在廳前迎接這位「神女」的時候，「覺得她的來蹤去跡是千真萬真的」，甚至與其「有一種近乎心靈通神的快樂」。

另一次，他站在路旁觀看一位護國粮王出巡，回家後發熱不適，便向母親說：「我今日看見菩薩出會，他的眼睛動了一動，或者我因此便生病了罷」。其實趙心裡知道這是「虛話」，但卻懇切地告訴別人自己看見菩薩的眼睛動了，爲這顯象作見證。

民間信仰的善惡報應觀也深深底形塑趙的思想。趙家裡藏書不多，善書卻居其半。他常翻閱《覺世經》、《勸世文》、《陰騭文》、《太上感應篇》等善書，並作評點。又會在晚上將《劉香女寶卷》讀給母親，每念至劉香女受苦修行之處，便禁不住下淚，泣不可止，事後仍不斷思想寶卷的內容。

---

[5] 古愛華（Winfried Glüer）著，鄧肇明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藝，1998），本書原爲古氏德文撰寫的博士論文，於一九七九年出版。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4）。邢福增：《尋索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

[6] 趙紫宸：《繫獄記》（上海：青年協會，1948 ），頁 78。除特別註明外，本節主要參考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生命》，第 4 卷 3 期（1923 年 11 月），頁 1 至 4。

[7]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in ***Truth and Life*** 4:7-8(Nov., 1929):10.

在觀看迎神賽會的神功戲時，其中一齣關於聖帝修行，遇觀音點化他說：「若要工夫深，鐵杵磨作繡花針」，聖帝最後憑信心成了菩薩。此等戲目傳遞的修行成仙的觀念，也在趙身上產生影響。他在賽會中，總會向祖母拿些銅錢來散給乞丐，爲自己累積功德。當他聽到別人說吃素時，又依樣葫蘆，全家只有他一人持素，他甚至一度萌生終身不娶之念。

十三歲那年，由於家道中落，趙不得已輟學，預備隨父從商。當時趙父要他獨居於商舖樓上，專心練學珠算記帳。這段日子，趙由於無法繼續學業，生活感到異常孤獨無聊，遂更多地投入宗教膜拜之中。當時他把紙張摺成神位，寫上觀世音及天神等名目，在舖樓上參拜，「心中覺得與神道非常接近，也覺得非常愉悅」。但同時，他內心又覺得修煉成仙之路，異常艱難，想到「人皆能僊去，我何獨不能」。

此時，他又曾在迎雲壇客串小道士，敬天禮斗，持齋誦經，心中覺得異常快愉。晚上在壇裡的草堆睡覺，清晨起來誦經，也不想甚麼「積功德，修來世」的事情，只是真心真意的作。

民間信仰的宗教經驗，對趙氏日後的宗教追尋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第一，他認同宗教與人生的密切關係。[8]第二，是由苦修行而成菩薩的倫理觀。兩者的關係可說是二而一，一而二的。由於民間信仰的倫理觀及修行觀，密切地影響了趙的生活，不知不覺間將宗教融入了人生。

與基督教相遇[9]

趙家附近有耶穌堂，家裡可以聽到主日禮拜的歌聲。偶爾趙的祖母也會領他去「看禮拜」，大抵因此結識了一位從鎮上來的基督徒，並且從中聽到「變法」「洋文」等事。趙紫宸本人顯然並不願隨父從商，這位基督徒表示可推薦他到蘇州入讀萃英書院。萃英書院爲長老會所辦，宗旨爲「注重基督化人格以資養成真正爲國家、教會及社會服務之人才」。[10]顯然，趙求學的心志獲得家人的認同與支持。關鍵是他究竟是繼續原有的科舉之途，還是讀洋書而已。這年趙十五歲，時維一九〇三年，科舉考試仍是主流教育之路，但新式學教亦趨普及。據趙自述，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上杭州讀中國書或是上蘇州讀外國書。

趙個人的意願是到蘇州去，因爲他希望能接受新教育，但是又聽人說萃英書院是教會學校，是「吃洋飯」的人辦的，與他向來接受的傳統不合，怕入了「邪教」，思想拿不定主意。[11]於是，趙到靈泉山覺海寺去問觀音，連求兩籤，一籤指到杭州是上吉，一籤謂赴蘇州是中平。但他心中並不歡喜，回家後向父母說：「上蘇州是上吉，上杭州是中平，我上蘇州去罷」。趙自述道：「這是第一次菩薩與我心願衝突，卻被我心願得了勝利。我想菩薩不該與我正常的欲求有甚麼衝突，從此我與許多人一般地不順從菩薩的命令了」。這個決定，標誌著趙與民間信仰「分道揚驃」，也爲其日後的宗教世界開拓了新的可能與空間。

---

[8]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徐寶謙編：《宗教經驗譚》（上海：青年協會，1934），頁 67。

[9] 除特別註明外，主要參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4 至 7。

[10] 蘇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蘇州市志》（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 1149。

[11] 王瑾希：〈基督教界愛國人士趙紫宸〉，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編》，第 12 輯（北京：1982），頁 85。

趙在萃英書院[12]就讀約一年時間，由於學校要求學生星期日必須參加主日禮拜，平日亦規定上聖經課，加上校方教員熱心向學生傳教，使趙氏「心熱如火」萌生信教之念。在校半年，趙有一次回到家中，立即把所有神符撕去。有趣的是，當時由於疫癘流行，家附近的廟宇舉辦打齋醮會，趙的一位啓蒙老師得悉其「叛教」舉動，特邀趙到廟中參加儀式，趙卻竟在「讀洋書，信道理」之餘，又客串作道士。「我固奚擇焉？甚矣哉。情之爲用也」。他所指的「情」，相信是不想令啓蒙老師難過，我們可見，這種「情」的關係，在往後其宗教歷程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趙後來形容自己，此階段對耶穌言行雖有感動，「在生活上卻依然毫無變化」。[13]看來，他對基督教的迎拒，端在於其「情」歸何處？

一九〇四年，趙計劃投考東吳大學預備科。當時入學要繳付八十元學費，趙父爲滿足趙上大學的心願，乃私下把趙母的儲蓄移作學費之用。[14]東吳學習初期，趙卻又成爲「非宗教運動的小健兒」。他說：「我覺得中國自有文明，西洋宗教，既爲迷信，更非所需，豈容染我中華淨土。」對於班中熱心傳教的同學，趙更當面直斥，被同學冠以「急先鋒」之名。他形容這是「愛國心」與「排教心」渾雜的經驗。這種排外排教的態度，主要是受班上另一些同學（「縉紳子弟」）的影響，隨聲附和。[15]

不過，在反教的同時，趙形容自己「有許多精神上的苦痛，無處訴說」。[16]於是當有熱心信教的同學邀請他參加宗教聚會，他又答允出席。[17]他所指的極大苦痛，首先是家庭經濟的困境。趙父營商不善，弄至債台高舉，趙深切體會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18]爲了維持生活及賺取學費，他過著極度刻苦的生活，即使半工讀也不敷支出，又要向校方貸款，到畢業時共欠中銀二佰八十圓，「愁之一字，日日滚在眉睫間」。[19]

另一個教趙十分苦惱的是婚姻問題。對此，趙沒有詳細說明，只說：「是很平常的痛苦；是很真切的痛苦，凡有這種經驗的人可以不言而喻，凡沒有這種經驗的人，雖費萬言，亦殊不能了然，所以不同曉曉了」。查趙紫宸於十七歲（一九〇五年）奉父母之命，和比他年長兩歲的小商人之女童定珍結婚。童氏沒有接受教育，在文化水平上與趙有極大的差距。[20]雖然父母包辦婚姻在當那個時代仍十分普遍，但也絕少會出現「男少

---

[12] 趙的後人趙蘿蕤與趙景心卻指趙在蘇州就讀的是桃塢中學（聖公會主辦）就讀，參黎新農：〈寂寞深時悟亦深——採訪趙紫宸先生在京子女札記〉，《金陵神學誌》，第 29 期（1996），頁 40；另趙蘿蕤、趙景心：〈我們的父親趙紫宸〉，燕京研究院編：《趙紫宸文集》，第 1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4。不過，趙紫宸本人從來沒有提及自己曾進桃塢中學，筆者仍據趙紫宸本人所言。

[13]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14] 王瑾希：〈基督教界愛國人士趙紫宸〉，頁 86。

[15]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16] 後來他在一篇英文文章中指，他當時處於精神上憂傷（mental depression），有著極大的痛苦。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0.

[17]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18] 趙曾咏詩一首，提及其父：「忠厚兼豪邁，經商卒不行。……斗栗春何待，債台築已成」。趙紫宸：《繫獄記》，頁 55。

[19] 入讀東吳大學後，每年需百數十元。當時趙母親典賣珠寶，父親變賣田地來補助學費。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4、頁 6。趙欠校方的款項，到他畢業後於中學任教一年後，東吳見其忠心，便把借契送給趙。

[20] 趙蘿蕤、趙景心：〈我們的父親趙紫宸〉，頁 6。趙的子女這樣形容其父母的婚姻關係：「父親與母親一同度過了七十三年的婚姻生活，該是金剛石的結婚紀念了吧！一九〇五年父親 17 歲奉父母之命和比他年長兩歲的小商人之女結了婚。我們親愛的母親沒有甚麼文化，在這方面和父親的差距極大，但是他們之間的感情非常深厚。七十多年來一直同甘共苦，我們做子女的爲有這樣的父親和母親而覺得幸福和驕傲」。

趙在一九四一年被日本人囚禁時，曾詠詩予其妻子：「幾夜魂相接，昨宵夢更親。豈惟遙

女長」的情況，何況男女雙方的背景又有著極大的差距，故此我們不排除這段婚姻有抒緩趙家財政困難的考慮。是次婚事完全是父母之命（在那個時代仍是「平常」之事），相信對已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趙來說，並不完全贊同，惟出於孝順父母之心，而勉強接受。加上兩人在年齡及文化上的差距，在在成爲趙結婚初期感到痛苦鬱結的原因（「真切的痛苦」）。[21]

上述兩種痛苦的驅策，無形中把趙引到宗教之中。他嘗言：「倘非痛苦相煎我決不會做基督徒，我不做基督徒，我決不會做好人」。爲甚麼痛苦經歷會促成趙的皈依呢？因爲他「竭力要找知心的人」，倘使有人領會他，賞識他，便成爲趙的恩人。而正是數名基督徒對趙的關愛與導引，把他領入基督教。趙說：

> **那幾年內，我有許多精神上的苦痛，無處訴說。學校中有宗教會集，熱心的信道同學，請我去參加，我也去了。**[22]

一九〇七年，穆德（John R. Mott）來華巡迴佈道，東吳亦是其中一站。趙出席了穆德的聚會，爲其演講所感動，有「暫時的感化」。後來，先後有李仲覃牧師、戈壁教授、文乃史教授、司馬德教授、陳海澄同學等，相繼在趙身上「用工夫」。有一次聚會後，趙留下向校長孫樂文（D. L. Anderson）請益，孫特吩趙曰：「紫宸，我看你乃一深思的青年，你當自思」。趙晚上回到臥室後，想及「我是一個深思的青年，孫先生知我也，士爲知者死可矣」。趙深感「知遇之厚」，加上與漸信道的同學相周旋，不到半年，便領洗成爲基督徒。東吳大學爲監理會所主辦，趙順理成章成爲監理會信徒。這時，另一位老師（R. D. Smart）又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欣喜聽到趙願意跟隨耶穌，並述說了對他極高的期望。這些師友的鼓勵，對趙的信教起了極大的作用。當趙感到困惑與困難時，他更深深經歷到，耶穌是眾人中最好的一位。[23]

趙從反教的「小健兒」到信了耶穌，最大的關鍵，就是在精神上得到寄託，理性的因素並不是佔有很大的位置。他於二十及三十年代對自己皈依的理解都是如此：

覿面，更復近挨身，密語均能會，悲懷忒認真，醒來翻自喜，不久有歸人。設想鳩驅鵲，城隅問卜居，形單難自料，囊澀更何如？憐惜原無補，才能綽有餘，不知離火宅，誰駕白牛車？」趙紫宸：《繫獄記》，頁 57。

[21] 趙紫宸在一九二六年出版的《耶穌的人生哲學》一書中，曾提及婚姻關係中的「節義主義」，未嘗不是爲他的個人經歷的反省：「父母之命不必聽；媒妁之言不必從；不過已娶的婦人不可不敬重，已嫁的夫不可可尊愛。人的快樂在於家庭；打破家庭，人便沒有快樂了！人的權能，在於節義，棄絕節義，人便沒有權能了！」。「未成婚的人，應當毅然決然實行自擇配偶的權利。祇有如此辦法，人生可免家庭的痛苦，可減終身的煩惱，可負最大的責任，若有少年男女，一時懦怯，懼父母的威權，貪祖宗的財產，勉強進入夫婦的關係，等到自立的候候，便將從前不負責而發生的痛苦煩惱，一切加在妻子或丈夫身上，自己則另娶別嫁，逍遙快樂，這等人是人類的蟊賊，同胞必要以法律，輿論，社會的反對，誅滅他們。這等少年男女心術不正；動機惡劣，祇求暫時的享受肉體的滿意，不知自己有人格，更不知尊重男子的人格與女子的人格。心術不正，決不能義，動機不當，決不能節，不義不節，爲人類賊！義是男子對於妻子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交托妻子；節是女子對於丈夫的忠貞，將清潔的身體與人格完全託付丈夫。國人能如此，國家便能興，國人不如此，國家則將亡。生命的泉源，當像清澄見底的溪流，流出來要爲生命的江河！」趙紫宸：《耶穌的人生哲學》（蘇州：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頁 142，146 至 147。

一九四一年底，趙在獄中曾作詩多首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例如：「三十八年逝水波，糟糠貧窘共經過。畫眉漸覺風情少，舉案頻驚淑惠多；此日離鸞棲枳棘，早時雛鳳邈煙羅；艱難最是匏瓜繫，相望相思奈爾何。」趙紫宸：《繫獄記》，頁 31。

[22]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23]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1.

> **那時我領受入教，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情感活動。這種活動，一方面為痛苦所驅策，又一方面為朋友所導引，完全是人格全體的發展，絕對不是理知的激蕩。**[24]

> **回憶當時，我實在不曾有新穎的宗教經驗。雖亦祈禱讀聖經，信從基督受死，為人類贖罪諸種教義，在理智上卻不曾獲得解釋。不過，精神有寄託，往往有心向善罷了。**[25]

質言之，趙的皈教，與其說是出於理知上的考慮，毋寧是由於經驗的催促。如何處理理知與經驗間的張力，不久便成爲他的實存挑戰。

一位清教徒的掙扎[26]

趙紫宸曾這樣形容自己信主初期的生活：

> **我初作基督徒，祇知祈禱，讀聖經，做禮拜，參加教會的工作。起初十年，我往往受感動，切求情感上的慰安與舒適，在宗教生活上忽冷忽熱，全無定準。大學畢業後，我因問題漸多，心中憂悶，需要迫切，所以祈禱亦比較勤，每日幾乎有三小時祈禱讀經的工夫。有兩三年我似乎有比較勝利的生活，說話也有力，行事也有力。自己的宗教便要傳給別人。大概那時的修養，似乎不是勉強作的，乃是很有興趣的，所以自己不期然而然地受了好的影響。修養之中，有四五個要素，在靜的方面是讀經祈禱，亦且讀些關於宗教的小書，在動的方面，是參加崇拜，宣傳宗教，服務教會。這些事合在一塊兒就是那時的靈修。其間有一個短時期，我竟覺得上帝親切的同在，竟有異夢，生活非常有定向。**[27]

這段文字，很能說明初信時趙的宗教經驗，值得進一步析論：

首先，是趙過著十分虔誠的宗教生活，他甚至用「清教徒」來形容自己。有時因功課教學繁重關係，趙紫宸於清早六時便在教室中獨自祈禱，作一日的預備。[28]在學期間，他受到「閉塞」的觀念影響，過著苦行式的生活。例如，生病不延醫、堅持信與不信者不能相交、渴望主再來、追求痛哭重生的經歷，及要求自己過著嚴謹的生活等。然而，「在這種苦行的狀況中，我的痛苦仍舊沒有停止，有時反來的更凶了」。換言之，皈依宗教不僅沒有給趙釋除原有的痛苦，反而爲其增加愁苦。其中最大的苦處，是家人初期因其信教而給予的壓力。當時趙母批評他「喫教」，趙父甚至向他施予體罰。由於信教緣故，趙拒絕參加祭祖及敬拜神佛之舉，更增加了家人的反感。家中發生的一切不如意事，也全都歸咎於趙信了洋教。然而，趙形容自己「心倒覺得快樂起來了」、「覺得自己是大祭司面前的彼得約翰」，一切受苦頓然變得「有價值」。藉著祈禱，趙感受到與上帝

---

[2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7。

[25]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26] 除特別註明外，參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7 至 12。

[27]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徐寶謙編：《靈修經驗譚》（上海：青年協會，1947），頁 18 至 19。

[28]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異常親切，因而能夠面對種種困惑與難關。[29]

此外，趙熱心參與傳教工作及教會的事奉。一九一〇年，趙於東吳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東吳）中學的英文、算術、聖經等科。這時，他仍維持每天讀經祈禱三小時。初期，他於臥室中祈禱，後來與胡某（宗權）[30]一起。數日後，竟吸引了廿三位學生加入。學生不乏因他的勸導而信教者，半年間，便有十七個學生領洗。趙的傳教熱忱，亦取得了相反的效果，特別是他那種指控人具罪性的傳教切入點，好幾次刺激了受眾，引起了對方的強烈不滿，反過來向趙破口大罵。對此，趙心裡卻大感不惑，愴然下淚。多年後趙形容自己是：「不知道人的心理，熱忱有餘，而智慧薄弱，偏執甚固，而識鑑淺陋。」[31]惟令趙感到欣慰者，經過近兩年家人的反對後，他最終帶領了自己的父母及妻子領洗。[32]事奉方面，趙紫宸又表現積極，先後擔任多項教會職事。[33]

這時，趙與上帝的關係可說是在平穩中又帶有反動。平穩方面，他嘗形容自己「覺得上帝的同在，如在面前」，這是一種「極真切，極密近的靈交」。對於這種熱切的宗教經驗，趙認爲是由於自己「長期祈禱修養的結果」，同時，他內心充滿信心，也讓他得感覺到真實。[34]

不過，趙紫宸這時仍面對著內心與外在的掙扎。內心方面，他承認自己在「青年性欲的衝動」難以自持，[35]有時會受到一些年青女士的吸引，在思想甚至夢境中墮入欲念。[36]也許他初期與妻子間的差距，亦強化了這方面的問題與困惑。期間他有一次特別的宗教經歷：他在夢中看見一個衣著如聖方濟派修士的黑衣人，領他遊歷。後進入一小室，不一會，他聽到有聲音對他說：「你爲甚麼使聖靈擔憂？」事後趙認爲在前夢境前他曾聽傳道人說過「使聖靈擔憂」一語，但他卻不認爲可完全用心理學來解釋此事。因爲心理學是自然科學，只能「察視心象，明其蘊結隱現的因果」，卻不能假設「幽冥」，故不能觀察現象以外的客觀真在。趙深切感受到，以科學來解釋宗教領域的經驗，顯然有其不善之處。更令趙覺得這次宗教經驗可貴之處，在於他在經歷此事後，「每逢情欲衝動，私念迭興，自欺欺人，放肆縱欲的時候」，他便想起「不要使聖靈擔憂」這句話，給予他及時的提醒，「勒住了懸崖的奔馬」。[37]由於能堅持「自律」，故在行爲上「未嘗越雷池一步」。但爲了克勝內心的欲念，他更「像一個修行的枯僧」。[38]對他而言，跟從耶穌就是奉行「道德理想主義」（moral idealism），靠著耶穌賜予的力量，去克服一切試探，實現人性的最大可能。[39]

外在方面，趙開始面對經驗與理解間的掙扎。打從受洗以來，他對於基督教的教義（如「寶血、替代、原罪」等）均毫無懷疑地接受，並視之爲信仰的權威。不過，當他逐漸覺察到自己的經驗與教義間未能協調，並致力於尋求理解時，便愈益懷疑教義的真

---

[29]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3.

[30] 〈中國信道教員〉，中華基督教續行委續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 1918》，第 5 期（上海：廣學會，1919），頁 304。

[31]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9。

[32]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1-12. 他甚至形容自己的母親在信主後，成爲一位很好的老基要派（a good old fundamentalist）。

[33] 這包括：蘇州監理會東循環（circle）鄰童主日學校主理，蘇州主日學聯合會會長，監理會宣教師，東吳大學青年會會長，監理會派赴美國的華代表。此外，他又先後領查經班，領奮興會、蓬帳佈道會主講席，團體書記等。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0。

[3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0。

[35]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36]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37]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0 至 71。

[38]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68。

[39]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實，「想來想去，全是破綻」。同時，他對清教徒式的苦修生活亦呈現張力。其中《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一章，讓他從「盡性」中得到覺悟，體會到不該壓迫人情的見解。後來他更徹悟到「人生須由物的媒介而逮心的印證」，盡性就是「人與心心相通，惟通爲盡」。換言之，基督教就是「上帝與人我，人我與上帝感通交和而已矣」，而耶穌就是「此中和通格的表顯而已矣」。

我們可見，趙之皈信主要是經驗先於理解，故當他經歷到兩者間有著不能調和的矛盾時，他對信仰本身的懷疑亦與日增加。趙氏最大的掙扎在於，一方面他領受新思想，[40]要破除迷信，爲其宗教生活作出合理的解釋。但另方面，又發覺其實要爲自己的宗教經驗尋找合理的解釋，無疑是椽木求魚。就以上述那個曾給他極大安慰的夢境而言，他事後的反省是：

> **我於得獲此種經驗之後，懷疑更深，常覺宗教的客觀對象，對著我的知識生活，是一個永遠崛強的疑問！宗教是教人得安慰的；但不是迷魂藥，麻醉劑；欲得正解，非冒險窮探，走上崎嶇嶄新的路徑不可。故宗教給人平安，亦給人不平安！**[41]

宗教經驗本身是人對上帝的欲望，而爲此種經驗尋找合理解釋則是理性的表現，後來，趙在《基督教哲學》中便把自己這種「理性」與「欲望」的掙扎道出：

> **理性找不到上帝，更不能解釋基督教任何一個信念。欲望則要有上帝，要親近上帝，更要將基督教的信念從死灰裡撥出熱炭來，做我生活裡的熱力。理性說，尋求真理，猶之夸父逐日，雖然死於鄧林之下，亦所不辭。欲望則說，世上的價值，人生的意義，必要保存的，猶之亞伯拉罕離鄉，雖然不知道走到那裡，亦依舊要走上去。理性說不知道的事情，且放在一邊等待解決；沒有解決，決勿去信。欲望說做人是今天就要做的，是連的，不是斷的；若要等到問題解決，再去做人，只怕清山埋骨，人已變作腐草飛燐了。為今之計，只有頭做頭的工，心做心的工，讓牠們不協作也罷。**[42]

質言之，處理「理性」與「經驗」間張力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把兩者置於獨立的領域，互不干涉。不過，這種「不協作」的手法，也許能抒緩其一時之苦，卻非長久之計。

三 .「自由人自走他路」

---

[40] 趙提及一件事，就是他曾以耶穌的死作論文，當時文乃史（W. B. Nance）教授對他的批評是：「你的思想，未免不合理罷」。史氏在神學上向趙提出指出，趙深認同，「所以把舊思想撇擲了」。文氏又是趙倫理學的老師，他常教導趙：「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切勿以「不知爲知」，這些教訓也對趙產生影響。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2。

趙紫宸的《基督教哲學》一書，便恭敬地獻給文乃史。趙題詞曰：「一飯之德不能忘，因爲我身體不饑了；綈袍之贈不能忘，因爲我身體有衣了。春風時雨小草榮，生意舒展寸心中；更比推食此恩深，上帝的寵愛臨身了；更比解衣比恩深，豐美的生命可分了」。趙紫宸：《基督教哲學》，頁首。

[41]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

[42]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頁 23 至 24。

我要解放

一九一四至一七年間，趙紫宸赴美進修，入讀監理會背景的梵德比（Vanderbilt）大學宗教學院（School of Religion）。一九一六年，趙獲頒文學碩士（M. A.）最高榮譽（Summa cum laude），主修哲學和社會學。一九一七年，完成神道學學士（B. D.），並獲頒授「創辦人獎章」（Founder's Medal）。[43]在美三年間，趙形容自己「思想雖漸有新機，經驗則並不加深」。[44]抑有進者，這種思想上的新機，卻進一步與其經驗相矛盾及衝擊，「思想反而不安定」。[45]趙深切覺悟「我要自去找尋我的道路」，而這條路向就是朝著理性的方向發展，「漸漸地把我從前的信仰思想改變了」。[46]

趙所改變者，包括教義及經驗兩方面。在教義方面，他以理性來審視所信的內容，於是「我的宗教，從自己有了悟澈直到現在，未嘗在異蹟神秘寶血童女天堂地獄上找根基，正像我從不在半夜裡找太陽一般。」他甚至認爲，如果有人能夠使他確信基督不足以作其救主，並提供充分的理由，那麼他便立即把基督教丟棄。[47]

宗教經驗方面，趙形容自己幾乎「停止了祈禱」，在信德上大大倒退。趙在靈修（他稱之爲修養）上的荒怠，筆者以爲，並不完全由於理性的衝擊。事實上，他在赴美前業已面對理性與經驗間的張力，但仍在宗教經驗上覺著真實的體會，經歷到與上帝親切的同在。那麼，促成趙氏在美思想改變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一方面，這與趙就讀的梵德比大學宗教學院的學術及宗教氛圍有密切關係。大學原屬美南監理會（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主辦，一九一五年五月後擺脫教會控制而獨立。[48]而原來以訓練教會傳道人才的聖經系（Biblical Department）也因此易名爲宗教學院。宗教學院的教學重點，主要是重宗教與倫理而輕神學，又強調以科學精神（scientific spirit）來發現宗教真理，並以民主來詮釋基督教的基本原則。[49]上述的學術及宗教背景，對我們探討趙氏思想的改變有重要的關係。

另方面，我們也得把上述宏觀背景置於趙個人思想的脈絡之下。我們可見，痛苦在趙氏昔日宗教經歷中，其實扮演著頗重要的角色。而在美三年半的日子，趙卻形容是他「生平最平安，最沒事，最無可述」的時期。[50]「生活雖安定，思想反而不安定」。而當時趙面對最大的困擾，是來自人事方面的問題。對此，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

> **在人事方面也發生了許多艱難。我總想基督徒是修養信德的，是祈禱讀經的。那裡知道事情不是這樣，表面上的虔敬，也許就是內心虛偽的顯現。**[51]

---

[43] "Catalog of Students, 1916-1917,"in ***Vanderbilt University Register, 1916-1917***, 193. "Scholastic Recorder—Biblical Department—Vanderbilt University of T. C. Chao,"（June 1917）, "Commencement Program,"（June 17, 1917）, Special Collection & University Archives, Jean & Alexander Heard Library, Vanderbilt University. 在"Catalog of Students, 1916-1917,"中，指趙的文學碩士主修爲經濟與哲學，有誤，應爲社會學與哲學。

[4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

[45]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19。

[46]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2 至 13。

[47]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2 至 13。

[48] 林榮洪：《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頁 41 至 42。另參 History of the Divinity School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http://divinity.library.vanderbilt.edu/div/intro/history.html，2004 年 6 月 15 日下載。

[49] "School of Religion," in ***Vanderbilt University Register, 1916-1917***, 109.

[50]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3。

[51]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19。

他所指的人事問題，主要把矛頭指向教會內某些僞善的敬虔者。因著這些僞善，促使趙在宗教經驗方面產生極大的反彈，進一步把趙推向思想反動一面。他認爲，不論從科學事實以至個人經驗上的體會，均與傳統教義的教導衝突。當他認定耶穌自己就是信仰的權威時，便決定把一切人爲的符號、組織以至神學均揚棄。[52]

在美期間，趙應邀爲《留美青年》撰文，在〈價值比較論〉一文，他提出了中國人提高生活所必須留意的四個維度——解放（emancipation），保持（conservation），收吸（assimilation），改造（reconstruction）。[53]，趙認爲這亦反映出其宗教變遷的途徑：

> **人到思想的監獄裡去，做了窮愁饑渴的囚奴，假使要得自由，祇有自己去動手實行解放自己。最可憐的人，就是一方面要冒險，一方面很膽小，明知他的理解不適合他的實驗，卻依舊不敢放膽去要求更確的理解，卻依舊免（勉）強潛伏在那違背近代最高深，最廣闊的社會道德，社會福音，社會與個人交通調劑的生活底破產宗教思想下討生活！不解放，無以保存，無以吸取，更無以改造，解放乃今日信徒的第一義第一事。**[54]

質言之，趙決定在宗教思想上打破舊有傳統的桎梏，揚棄與與現代思潮相違背的宗教思想，爲要尋找更正確的理解。解放思想成爲其當前首要關懷與當務之急。

反動與新派

一九一七年，趙紫宸學成回國，任教於東吳大學，同時又爲監理會工作。然而，回國後的趙氏，不論在個人、家庭以至國家方面，均遭遇上極不如意的困難以至悲劇。首先，他仍深受債務困擾。原來他赴美留學，並不是由監理會資助的。東吳大學共借了二千六百二十圓予趙。趙回國後，東吳大學每月從其薪金中扣除若干。所以趙對於有人說他出身微賤，全賴教會而得教育，有極大的不滿。他甚至形容自己的服務，不過是「一點一畫賣錢」。[55]

此外，他與監理會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探討。他曾代表監理會參與籌備全國基督教會議的工作，任事務委員。但他對教會的人物與組織，均曾流露出若干程度的「反感」，這些反感也促成了他思想反動的背景之一。[56]

家庭及國家方面，他曾在《基督教哲學》中略略談及：

> **我從離開學校之後，兄弟病死，遭回祿，遇強盜，萎靡不振了兩三年。睜眼一看，**

---

[52]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53] T. C. Chao, “Comparative Values,” in ***Liu Mei Tsing Nien*** 3:4(May 1917), 194. 本文蒙上海復旦大學徐以驊教授惠賜，謹此致謝。

[5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4 至 15。

[55]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4，15。

[56]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15。趙沒有詳細交代，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是極普通的，不說也罷了」。

筆者估計，也許趙不滿監理會內某些人事與組織，但同時，監理會方面也對趙的神學思想有所保留，他們之間的不協調的關係，可以是雙方面的。

國家危弱，同胞淪落，自己則一籌莫展，幾乎有精神待弊的危險。[57]

趙紫宸提及病死的兄弟，是他的二弟趙子雲和三弟趙之惠。原來趙不但自己奮發求學，在自己回國後，更把兩位弟弟接到蘇州學習，讓他們進入東吳就讀，趙之惠更得以留學美國。不過，當兩人學有所成之際，卻先後病逝，令趙至爲傷心。[58]他嘗言，「我的二弟死了，死了一個誠實忠正的青年。我的三弟死了，死了一個活潑的，有見證的少年英雋。這兩個人死了是死了半個我，……他們死，剩了三個人中間的一個我」。[59]

四十年代初，趙紫宸被囚於日本集中營時，憶起兩位早逝胞弟，曾爲其詠詩兩首，反映出其思念之情：[60]

二弟性剛拙，清純有孝思，童年明灑掃，儉德省銖錙，餬口離家早，論心向學遲，可憐方受室，風雨損連枝。詠二亡弟子雲。

三弟多才氣，卓然意不群，十年經學校，一載奮風雲，瘵疾終難救，椎心獨不聞，嗟哉霜雪至，原上鶺鴒分。詠三亡弟之惠。

在趙眼中，趙子雲安守本分，心地純潔又考順，從少便協助家務，養成節儉品德。爲了生計離家，少年時失去了求學機會。沒想到剛剛成家立室便病逝。至於趙之惠，才華超卓，讀了十年書，正要成就大業之際，又得頑疾而亡，兄弟永別。[61]

兩位弟弟英年早逝，難免對趙的信仰帶來莫大的衝擊。爲何上帝不憐愛兩人？當時趙氏肯定於兩人病重之時，熱切爲其得醫治祈禱，奈何上帝並無應允。難怪趙說：「這兩個人死了是死了半個我；在我血裡也種了反動的種子」。他所指的「反動」，源於如何在痛苦中尋求理解。在而企圖徹底澄清自己的經驗及宗教教義時，問題更接而連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來想去」，信仰「全是破綻」。趙氏「專用頭腦的工夫」，使他的信心也冷淡起來。[62]

至於國家社會方面，他回國時中國正值新文化運動，趙亦深受影響。[63]他形容「觸目都是惱人的刺激」，[64]自己因受美國哲學的影響及中國新思潮的感力，「樣樣事情皆向新的路上走」。五四運動後，他於《青年進步》發表了兩篇文章——〈宗教與境變〉、〈促

---

[57]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上海：中華基督教文社，1926），頁 23。

[58] 黎新農：〈寂寞深時悟亦深——採訪趙紫宸先生在京子女札記〉，頁 40。

趙子雲結婚不久因庸醫誤診而離世，遺下終身守寡的妻子和遺複女，趙之惠由美留學回國，還未婚配，就患肺病不治而死。這成爲趙「最傷心的事」，參趙蘿蕤、趙景心：〈我們的父親趙紫宸〉，頁 4。

[59]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5。

[60] 趙紫宸：《繫獄記》，頁 55。

[61] 詩文的註解參孔祥錦及黎新農對《繫獄記》的加註本。參趙紫宸：《繫獄記（加注本）》（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附文字工作室，1996），頁 90 至 91。

[62]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5。

[63] 他說：「回國之後，……因鑑於中國社會須要根本改造，故對於新思潮及種種愛國運動，亦頗注意。」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他於一九一八年在《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發表的文章，便充分反映其在處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時抱持的「新舊」「中西」對立二元觀。參 T. C.Chao, “The Appeal of Christianity to the Chinese Mind,” ***Chinese Recorder*** XLIX:5 (May 1918): 288-296, XLIX: 6 (June 1918): 371-380. 另參邢福增：〈趙紫宸早期本色神學評析〉，氏著：《尋索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42 至 43，頁 52 至 55。

[6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5。

進宗教革新的動力〉，在在反映出他對基督教應自我革新，以回應新思潮的祈盼。[65]

這種革新基督教的傾向，也反映在其教會工作上。他在東吳大學帶領了十多名學生信教，在領洗禮前的查問信德時，他竟「嚴厲」地向牧師說：「這些人領洗的時候，絕對不能按照監理會綱例的條問回答，因爲他們不明白童女生子，肉身復活那一類的事」。[66]期間，他又撰寫了極具爭議性的〈對於信經的我見〉一文，全盤否定使徒信經的內容，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主要是理性及科學標準），重訂信經。[67]因爲，教會所堅持的教義，既不能忠於耶穌的教導，也與科學精神及其個人宗教經驗不符。[68]正統基督教教義，在趙眼中，幾是「異端」的同義詞。[69]

趙的宗教思想愈趨「反動」，也招惹了更多的抨擊，被斥爲「講異端」的人。面對種種批評，趙的反應是「爲甚麼怕將真理教人呢？」打破（解放）了別人的信仰，又有何壞處呢？「自由人自走他的路罷」：

> **…我的演講也沒有拘束了。我對於各種教義，重新審查起來了。於是我完全自由完全解放了。我深深地感謝那批評我的朋友，徵諸公我安得有如此的自由，如此的清潔合理的宗教？**[70]

一九二三年，他爲〈我的宗教經驗〉一文作結時，這樣爲自己的情況作結：

> **我已從神秘生活中出來轉入了純粹的倫理生活；從普通的空論出來轉入了科學環境，從籠統的玄想裡出來轉入了真切的，實際的經驗與經驗的準切研究；從老成的狀態裡出來轉入了少壯的狀態；從個人的宗教出來轉入了社會的宗教；從他世界出來轉入了現在的世界；從絕對論裡出來轉入了實驗主義；從修行動作裡出來轉入了圓滿的人間的有生趣的境界。終日勞苦，但覺愉悅，時刻奮鬥，卻有精神。我更加找見了自己。**[71]

由於受到「實驗主義」及「現代主義」的影響，趙既發現不能爲宗教信仰找到哲學上的基礎與理解，其「修養」亦進一步「懈怠下來」。[72]在他心目中，倫理的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至於宗教的神秘經驗，就著趙的思想而言，顯然已爲他所揚棄了。[73]

人生是友誼

---

[65] 趙紫宸：〈宗教與境變〉，《青年進步》第 30 冊(1920.2)；另〈促進宗教革新的勢力〉，《青年進步》第 31 冊(1920.3)。

[66]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

[67] 趙紫宸：〈對於信經的我見〉，《生命》，第 1 卷 2 冊（1920 年 9 月），頁 1 至 11。趙在另文中指，「如今基督教裡還有藐視科學，畏懼科學的態度，不敢在根本信條上生正確的見解，這就是基督教裡存留的不誠實，不誠實就是沒有真理的靈在裡面，就是不道德！」趙紫宸：〈新境對於基就突的祈嚮〉，《生命》，第 1 卷 4 冊（1920 年 11 月），頁 11。

[68]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69] T. C. Chao, “Jesus and the Reality of God,” in ***Truth and Life*** 7:5 (March 1933): 1.

[70]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5。

[71]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6。

[72]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19。

[73] 趙紫宸講，徐曼筆記：〈我們要甚麼樣的宗教？〉，《生命》，第 3 卷 9 冊（1923 年 5 月），頁 3 至 4。

趙紫宸嘗形容自己在精神上的痛苦，就是「心交閉塞」，由此使他覺悟到人生無上的價值與真際，就是「人心交和的生活」。而一切的實現，皆歸於「完全的心交」。他精神上最大的「愉悅」，就是得到良師益友的關愛，讓他明白「吾人一切的知識，一切的實現，皆歸於完全的心交」。[74]

一九二三年，他爲好友簡又文《宗教與人生》一書撰序時，指出當前知識已將宗教「打掃了一番」，甚至把「祭壇」也拆毀。即便如此，人類仍打從心底裡大喊說：「維持我，安慰我，救度我，尋找我的神在那裡？」當科學把神逐出去後，趙相信，人仍可以在「人心的聖殿」尋見神。意思就是人唯有在現世真實的人裡面來「面見神」。而耶穌完美的人格及至善的行爲中，便把「人生的真詮詁訂了」。這樣，「從前超越的神，見而爲今日貫注的神了」。科學及知識好像破除了信仰，但卻同時創造了信仰。他體會到人生就是「友誼」，而宗教就是人「最忠信的朋友」。[75]無疑，這位耶穌就是人最需要的朋友。[76]

在這種情況下，趙深切覺著「人生是友誼」這句話的珍貴。事實上，他得不到上帝的幫助，自然就需要人的授手，「我依靠朋友爲修養心靈的動力」。[77]他說：

> **朋友呀，世上甚麼寶貝比朋友還要貴重，比朋友還更能使我們心滿意足呢？……當此春光濃豔的時候，我的靈魂要開心門說：四方愛朋友的人呀，來！來到我們的神，我們的友朋裡，大家享受這精神的團契，無限量的生命。**[78]

趙相信，如果不能與朋友結成團契，那麼，任憑神學家「在虛玄裡找理解」，或是實行家「從經驗中找信仰」，都不能真箇明白信仰的實在，更遑論是「有道可傳」。[79]

我們可見，此時趙紫宸最爲折服的就是耶穌的人格。他感受到耶穌的「人性人心」最與他接近，成爲「我心我人格的救主」。[80]趙先後出版了多本著作，均以人格爲中心。主要包括兩本供青年人討論的經課——《美滿生活是甚麼？》（1923）、《基督與我的人格》（1925），以及兩本反映其早期自由神學的專著——《基督教哲學》（1926）與《耶穌的人生哲學》（1926）。耶穌所能吸引趙者，並不是因爲他是上帝的兒子，而是他是一位完全的人（thoroughly human being）。[81]

趙在《基督與我的人格》中強調，耶穌具有人格造就的三大要素：模範、目標、能力。他說：

> **基督將上帝的心表現給我們，也把人的可能發揮出來。神人的精神品德，都在他人格裡統一；所以他足以做我們的模範。他來宣傳天國，重估人與人的關係和價值，使我們知道做人應當維持甚麼，創造甚麼；所以他垂示了我們做人的目標。**

---

[7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1。

[75] 趙紫宸：〈宗教與人生序〉，簡又文：《宗教與人生》（上海：青年協會，1923），頁 3 至 5。

[76] T. C. Chao, “Jesus and the Reality of God,” 5.

[77]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19。

[78] 趙紫宸：〈宗教與人生序〉，頁 5 至 6。

[79] 趙紫宸：〈超時代——宏聖道〉，《真理與生命》，第 1 卷 3 期（1926 年 5 月），頁 59。

[80]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4。

[81] T. C. Chao, “Jesus and the Reality of God,” 1.

> **最緊張的，是他自己經過一切，制勝一切，得大神通，具大神力，使我們知道人格的能力有無盡藏的根源。他怎樣得權能，我們也可以怎樣得權能。這樣，基督與人格，與我的關係，豈不了然？**[82]

至於《基督教哲學》一書，共十餘萬字，更被趙氏視爲其第一本著作，[83]他所主要處理的問題，就是爲基督教信仰建立理性基礎：

> **我們信耶穌的人，在今日備嘗艱辛，信仰的根基都搖動了。我們中間許多人好像出岫的雲，歸不得海上的高峰；好像離山的水，歸不得谷裡的清溪。然而誰真信耶穌，而心中不交戰呢？理性與信仰戰，人言與我執戰，戰雲迷目，鼙鼓亂耳，心旌搖曳，六神無主，終日的亂奔亂竄，畏首畏尾，豈不痛心麼？我的問題，是今日許多人的問題，就是：我們有甚麼信耶穌的理性？我們對於今日的中國，有甚麼道可傳，有甚麼力量傳此道？**[84]

《基督教哲學》付梓後，趙又完成其姊妹篇《耶穌的人生哲學》，主要依據馬太福音書登山寶訓，來詮釋耶穌的人生哲學。全書十多萬字，悉以「主義」爲題，統合爲耶穌的「人格主義」，反映出趙氏在人格救國方面的理念。其時趙的心境是：

> **我現在心愛上帝，好像看見過他是真的一樣。……我是人格，又是宙宇的分子，宇宙中整個的勢力若非人格，若非有人格性，則何能於我而為人格呢？我的推想在我信仰中像大船的鐵錨一般，拋在波濤中，我自己有安心立命的快慰了。**[85]

《基督教哲學》及《耶穌的人生哲學》兩書，成爲趙紫宸二十年代經典著作，反映其早年自由主義神學的格局。顯然，自由主義成爲趙的思想與信仰歸宿，安身立命之基礎所在。

四．「我的心不甯息」

不肯迷信

趙紫宸精神上得到的快慰，相信並不持久。二十年代中葉開始，他在著作裡，再次呈現出某種信仰緊張，逐漸擺脫那種走出神秘宗教經驗的自誇；並從懈怠修養，停止禱告的狀態改爲肯定修養及禱告在宗教經驗上的重要性。他承認基督徒的靈修是一種精神生活，「因信而從跳不出的理智範圍裡一躍而出直，入神秘的境界」。基督徒在這種親近上帝的神秘經歷中得著能力。[86]

顯然，他初時對這種經歷卻有著頗大的抗拒。

---

[82] 趙紫宸：《耶穌與我的人格》（上海：青年協會，1925），頁 20 至 21。

[83] 也許趙認爲，《美滿生活是甚麼？》與《基督與我的人格》兩書，只是他編撰的經課討論本，算不上嚴格的專著。

[84]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自序頁 7。

[85] 趙紫宸：〈序〉，《耶穌的人生哲學》，收《趙紫宸文集》，第 1 卷，頁 185。原由中華基督教文社於 1926 年出版。

[86] 趙紫宸：〈本期弁言〉，《真理與生命》，第 2 卷 6 期（1927 年 4 月），頁 143。

先是，趙再次經歷異夢。一九二五年底，趙於蘇州埋首於撰寫《耶穌的人生哲學》時，突然收到家鄉電報，謂「母氣將絕，全家速來」，惜趙母在趙舉家趕抵前業已離世。趙自言深受其母親周氏影響，加上未能見其最後一面，因此悲痛異常。他想起於母親離世前一個月，忙於寫作，「天天作文，愉快中總有一縷悲慘的幽情」，以爲是身子不健全使然，現在才明白其悲愴的情緒，「或者是有意思的」。原來期間他曾在夢中與母親相遇，不過，他由於「不肯迷信」，只在詩裡略予交代，詩曰：

> **一月前母親到我夢中來，**
> **手捫心胸哀哀地哭泣，**
> **母親說：「兒啊，我那裡會死，**
> **你祗須努力，你不須悲切。」**
> **一月中我的精神不安頓，**
> **快樂中常帶一縷慘淡色；**
> **那知道慈母憂我的別離心，**
> **冥冥之中久與我來相觸接。**[87]

毋庸置疑，是次夢境給趙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但他卻有意無意地不予深究，高呼「不肯迷信」。

孤苦的追求

不過，這時趙紫宸的內心，卻有著深層的孤單與不安，他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我的宗教經驗〉中，剖白了其心靈乾枯的狀況：

> **在近十年間，我的生活常在孤獨與憂患中。雖有機會常常講道及研究宗教哲學，然終感覺到我的追求是一件孤苦的事情。我講道教學時，常將自己傾倒出來，有幾個青年曾說受了我深厚的輔助；但我自己心靈乾枯，竟不能從同事同學得心中所渴求的靈恩。我的座右銘是『人生是友誼』五個字；不過我深知朋友不能在宗教上，在靈魂的隱秘處，與我相周旋。我的心不甯息，不平安，所要求的，朋友不能給，因我心深處的懇求是莫可名狀的，祗可以說，我要得上帝。我所要求的，哲學也不能給，因為哲學到底是理論，無論如何周密，終對實際的宗教生活有重要的遺漏。不過我一面實際的在上帝面前生活，一面仍舊在學識的路途，探求宗教的正解。**[88]

可見，趙紫宸在二十年代中葉以後，心靈異常枯乾，外在的職事（研究、講學、講道）與內在屬靈的境狀間呈現出不平衡的困局。一方面，他想要「得著上帝」，但另方面，卻發現朋友與哲學均不能滿足他的渴求。

除此以外，中國國難當前，以及基督教受到教外人士的批判，也在在教趙氏感到憂

---

[87] 趙紫宸：〈序〉，《耶穌的人生哲學》，《趙紫宸文集》，第 1 卷，頁 185、188 至 189。
[88]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2 至 73。

戚。當他愈確切相信中國需要基督教時，卻又感受到中國教會及信徒的不足及欠缺：

> **我不但是常感孤獨，且時覺生活被壓迫在重重愁慘之下。尤其是這三年來，國難臨頭，外則強鄰肆虐，內則農村破產，往往使我憂心如海。我所最感痛苦的，就是基督救人救心的福音，在中國急需乎此的時候，被教內外的人們同樣的唾棄。基督教真理的生活力並不在中國的基督徒中有蓬勃的發展；我們中國信徒不但是沒有了正解，並且不曾有此生活洋溢乎其間。教外的思想者並非常瞀亂，或扭於一種不正確的科學觀，或因於歷史知識的缺乏，或惑於各種政治社會論的偏斷，就倡非宗教，非基督教的言論。**[89]

多年來，趙紫宸積極參與了基督教界對新思潮的回應，成爲其中一員猛將。對此他的反省是：新思潮解放了生活，使人重新估量一切價值，卻沒有給人「一種建設人生的維持勢力」和「一種安心立命的根基」。個人主義的泛濫，動搖甚至推翻了舊有的倫理道德，卻無法創建新的根基。相對主義的價值觀，否認有絕對真實的存在，連帶把絕對的信仰也揚棄了。[90]在這種氛圍下，基督教備受批判，更逼使他去思考甚麼才是基督教的「實在」，其可發揮的獨特貢獻又安在？他又深切自責，認爲基督教的領袖是否對信仰「有深切的了解，堅強的把握，清楚的理論，精明的經驗」？唯有人確切被基督教的「實在」所尋著，以此爲根基，與其發生密切關係，人才能知道及信仰「實在」。[91]

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重建將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趙從沒有動搖的信念。他所困擾的問題是，究竟甚麼是基督教的獨特貢獻？一方面，趙覺著基督教不應把社會服務視作基督教的根本信仰與專作事工，[92]另方面，他又強調必須反求諸己，基督徒在參與建設社會時，「必先要建設我們自己的宗教經驗與信仰」，「若要強迫我們應用基督的生活到政治經濟生活上去，（乃是基督徒應當作的事）我們總得有些宗教經驗與信仰，生命與能力纔行」。[93]

與此同時，趙紫宸在探討基督教的本色化時，留意到中國文化中也十分重視神秘經驗，這從《易經》、《道德經》、《莊子》中充分流露。中國人的務實，也不能否定這種神秘經驗，諸如「幽」「玄」「妙」「如」等文字，在在說明理性與非理性的「銜接」。他因而體會到，基督教若要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發展，必須在「神秘宗教經驗」方面有「深邃的得獲」。因爲唯有基督徒得著這種「經驗的虔信」，始能實證基督教的存在，「無論怎樣受掊擊、受逼害也不能損其毫髮」。他更覺悟到心理學把宗教／神秘經驗視爲工具，因而否定了經驗的對象。[94]

修養與禱告

毋庸置疑，二十年代中葉以還，神秘生活在趙紫宸的宗教經驗中的角色，變得愈來愈重要。[95]他曾輕描淡寫地說：「生活不能常是渙散的，問題固然不少，祈禱卻終不可缺。

---

[89]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3。

[90] 趙紫宸：〈新酒〉，《真理與生命》，第 4 卷 9 至 10 期（1929 年 12 月），頁 9 至 10。

[91] 趙紫宸：〈新酒〉，頁 11 至 14。

[92] 趙紫宸：〈新酒〉，頁 11。

[93] 趙紫宸：〈編輯者言〉，《真理與生命》，第 2 卷 20 期（1928 年 2 月），頁 551。

[94]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第 2 卷 9 至 10 期（1927 年 6 月），頁 258 至 259。

[95] 他說：「神秘生活並非無真實的意義」「圓滿的人生又安能廢除了修行的鍛鍊？」，參

於是過了些時，又不期然而然地回到修養的路上來」。[96]

首先，他反過來指出，全然否定「神秘生活」的做法，才是真正的迷信與詐僞。因爲「祇有生命能夠識生命，祇有經驗能夠了解經驗」，唯有「澈底的了解」及「深入的經驗」，始能尋著信仰實在的根基。[97]信仰包含著「奧秘」，但他不再企圖用科學來解釋（其實是打破）奧秘，反倒是承認奧秘的存在，並用生命及經驗來作出理解。[98]他不滿意簡單地把「修養」（spirituality）與「肉體」（corporeality）對立，也不認同把修養等同自我否定的苦行。那麼，甚麼才是修養呢？趙認爲人在尋求上帝的旨意，愛神愛人，由此而開展的生活素質。沒有了上帝的真在，也就沒有「修養」可言。[99]後來，他進一步明確宣告，沒有神秘生活，即無宗教。[100]

其次，他再次肯定祈禱在宗教生活中的位置及重要，將之視作「宗教的中心」。[101]趙紫宸指出信徒普遍對祈禱的兩個誤解：道德的和知識的。道德的誤解就是信徒企圖藉著熱心祈禱向上帝有所求。要是上帝不答應（「不靈」），就對信仰產生疑慮，遠離上帝，不再有宗教生活。「殊不知禱告乃是要人知道上帝的旨意，努力遵所知的旨意而行，並不是要上帝知道人的旨意。」[102]至於知識的誤解，就是指某些受科學（特別是心理學）影響者，把祈禱視作「一種心境，一種反射作用」，卻忽視了「客觀上帝的存在」。這種對祈禱的偏差與錯誤，結果使人「有了急要祈禱而不能祈禱的矛盾心境」。最後由於無法解決，就放棄祈禱，而用默想，省察，體認，涵養等等的自修來代替祈禱。[103]

筆者相信，趙所指的兩種關於祈禱的錯誤，其實也正是他個人的寫照。他初信時犯上了道德的錯誤，以致在困難及痛苦中祈禱，卻不獲上帝的應允（他個人早年經歷的痛苦，如兩位弟弟的早逝），使他感到困惑，失去了祈禱的動力。後來他受新思潮影響，特別是受制於科學及心理學，又犯上了知識的錯誤，把祈禱約化成爲迷信及心理反應。最後，他不得不再次肯定祈禱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他說：

> **我們祈禱，因為我們信仰一個全善而全能，內在而超越的上帝；我們信仰這樣的上帝，所以我們能夠專求上帝是美意成全，打破對於祈禱道德上的誤解，能夠達到上帝的真在，而打破對於祈禱知識上的誤解。我們祈禱，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生活的中心是上帝……祈禱的中心就是人將自己交託給上帝，而因此得有上帝自己做人的實在，做人的基業。**[10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2。

[96]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19。

[97] 趙紫宸：〈耶穌的死〉，《真理與生命》，第 2 卷 15 期（1927 年月），頁 420。

[98] 趙紫宸：〈耶穌的死〉，頁 425。

[99] T. C. Chao, “My Ideas of ‘Spirituality’,” ***Chinese Recorder*** LVIII:10 (Oct. 1927): 634-635.

[100] 趙紫宸：〈基督教與中國的心理建設〉，《真理與生命》，第 6 卷 8 期（1932 年 6 月），頁 10。

[101] 「祈禱是宗教的中心，是宗教的靈魂；有祈禱然後有宗教，沒有祈禱，然後儀式雖存，宗教卻澌泯無存了」。趙紫宸：〈祈禱〉，《真理與生命》，第 2 卷 17 期（1927 年 12 月），頁 14 至 15。

[102] 趙紫宸：〈祈禱〉，頁 15 至 16。

[103] 趙紫宸：〈祈禱〉，頁 16 至 18。他認爲，默想，省察，體認，涵養等，至多不過爲祈禱的成分，而不能爲祈禱的全體。祈禱是人因自己的無用，不全，而求上帝臨格，「由我達他，由我接觸超我的非我」。趙重申，上帝不僅是「內在的靈」，同時也是「超越的靈」。沒有了上帝，就不是祈禱。

[104] 趙紫宸：〈祈禱〉，頁 18。他又說：「祈禱的作用是在於人與上帝有愛裡的連結，使上帝的靈得住在人中間，使人得遵行上帝的旨意」（頁 22）。

一九三一年，趙出版首本禱文集——《祈嚮》，在序言中，再次表達他對祈禱的理解。他強調科學哲學即或能改變宗教的觀念，卻不能「侵佔宗教的領域」，廢止祈禱。他認爲祈禱是人的本性流露，「今也，天下有惑有不惑；予雖無以回天下之惑，卻有以自決其祈嚮」。人在艱難時更需要向上帝呼求，「理知所不逮的解釋，祈禱可以爲我剖析，行爲所不及的事功，祈禱可以爲我成全」。這種通過祈禱而獲得的「平安」與「深情」，就是趙個人的真實經歷。[105]

獨特性的尋求

趙紫宸對其困惑與改變的自我解說是：

> **民國十五年，我入燕京大學教書，思想漸漸改變，大都是環境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應。十七年，我遊歷耶路撒冷，英國及西歐，經驗與思想，亦經過了部分的變遷。二十一年夏，我重遊英國，留學一年，在宗教思想上，稍有比前深刻的見解。**[106]

趙氏提及了三方面值得留意的地方：（一）一九二六年他從東吳大學轉到燕京大學宗教學院任教，兩年後更接任院長一職；（二）一九二八年，他代表中國教會參加耶路撒冷的國際宣教會議；（三）一九三二年，他在英國進一步接觸了新正統主義神學。筆者曾在另文探討這三者對趙的影響，在此不再贅言。[107]扼要而言，趙轉職燕大宗教學院後，標誌著他投身神學教育的工作，特別是思想到教會與神學教育的關係，以及神學教育與大學體制的張力等，這均對趙的神學思想帶來挑戰。另方面，他在耶路撒冷及英國的經歷，教他愈益認同尋索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並因此下啓其在三十年代以還神學思想的深化及調整。

那麼，趙所指的「改變」、「變遷」及「深刻的見解」，與他的心靈孤獨又有何關係？筆者以爲，這可從三方面來說明：（一）當趙紫宸對於甚麼是基督教的「真在」作出深切的反省時，他便愈益對舊日從哲學及倫理的角度來爲基督教定位有所不滿。他覺悟到自己需要並且不應懼怕順服「權威」；[108]（二）他又更深的體會到，他所揚棄的神秘宗教經驗，原來在尋求上帝的過程中，竟又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形容基督教是「一種宗教奧秘與倫理生活合併的宗教」，每位信徒都能從自身的宗教經驗中了解到基督教的價值與貢獻，「心中覺到這神的愛力的，實在不能不有見於生命的意義，自己的歸宿，與一切有的統一」；[109]（三）他對教會（有組織的信仰群體）的重視程度也漸趨增加，明確宣告不能只要宗教而不需教會。[110]

---

[105] 趙紫宸：〈序〉，氏著：《祈嚮》（上海：廣學會，1931），頁 1 至 2。

[106]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

[107] 邢福增：〈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思想的中心課題〉，氏著：《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18 至 23。

[108]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2.

[109] 趙紫宸：〈我對於創造中國基督教會的幾個意見〉，《真光》，第 26 卷 6 號（1927 年 6 月），頁 2。趙在此文中肯定「個人化的宗教生活」，「獨對上帝是宗教中的妙境，深於宗教的人莫不由此獨對工夫得能力與熱誠。」如果教會不保持這種「超絕的生活」，就沒有人知道宗教的實在，基督教也就必「化爲彊石」。因此，他不滿「近代派」把宗教降爲倫理，認爲如此便「無根基與能力」（「基要派」的問題則是將宗教『擠成一團很焐的舊教理』）。宗教必須保留「出世間生活」，注重個人靈修，但又要保留「入世間生活」，注重「社會福音」。（頁 10）

[110] 參邢福增：〈趙紫宸的教會論——兼論其在中共建國後的教會改革觀〉，氏著：《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127 至 130。他曾表示，假使教會以建設的方法（a constructive way）不干涉他的思考以及表達思想的自由（而非嚴厲的批判），他是十分樂意在其

有一篇禱文，很能反映出趙的心境，特別是對知識限制的體會：

> **慈愛的上帝啊，當此思潮澎湃的時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我們心愛真理，力闢迷妄，願當我們的心交給真理，但當著迷離駁雜的思想，我們無所適從。父啊，你的慈容，被荒謬的信念蒙蔽了，武斷的思想隔斷了。你的恩澤又被偏激的言論阻礙了，片面的學術堵塞了。我們因為智識的飢荒，既啜著陳言舊說的糟粕，復嘗著哲理科學的酸果，以致精神生活日益虧損。我們在頑固的思想，偏激的學術中間，猶扁舟夜行，暗礁滿布。但是主啊，我們的心呼喊著說，我們信上帝，我們愛上帝。我們隱隱地聽你答應著，看見你引導著。父啊，求你增進我們的信仰，山蒼翠而巍峨，不是你尊嚴的表示麼？水蕩蕩的迴流，不是你愛心的運轉麼？……我們的心呼嘯了，呼嘯了！我們在電子裡揣測你，在天演裡遇見你，在宗教裡崇拜你！我們怎還不信呢？主啊，慈悲的父啊，求你使我們將心身獻給你，對於你有根深蒂固的信賴。**[111]

在另一首題爲〈妥協〉的詩中，他同樣表白自己正爲知識所「束縛」。[112]一九三四年，趙紫宸在《基督教的中心信仰》中，明確宣告信仰並不是一個可供證實或推翻的「假定」，而是「一種熱切的肯定，不待證實而已成實在的東西」。質言之，「信仰就祇是信仰。信仰沒有憑據，並且不需要憑據，因爲信仰本身就是憑據」。[113]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間，他再次通過「對話文體」的創作，來開展他對信仰與時代問題的思考，[114]反映出他對科學與哲學的不滿。他又形容自己昔日的表現是「愚人膽大」、「偏僻好新」、「不務實際的耀武揚威」。[115]而他也愈益不滿基督教現代主義及自由主義，批評其拚命地與科學「講和」，卻把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悶死」其中，「想把宗教的真際整個兒的推而納之於現代思想之中，而以根本上殘缺破碎的見解，湊合出一個整全的統系來」。[116]

不過，他也覺得自己要實際的在上帝面前生活，但卻又不能完全揚棄「老我」，要

「規範」（pale）內工作及生活，爲信徒群體作出一點貢獻。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3. 得指出，趙在一九二八年間曾認真考慮是否接受按牧。參邢福增：〈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思想的中心課題〉，頁 21。

[111] 趙紫宸：《祈嚮》，頁 49 至 51。

[112] 趙紫宸：〈妥協〉，《真理與生命》，第 4 卷 1 期（1929 年 3 月），頁 21。其中曰：「我的自由全在了解死的知識！轉了惡圈，轉了跳不出的惡圈」，「因爲束縛我的也就是這知識」。

[113] 趙紫宸：《基督教的中心信仰》（上海：青年協會，1934），頁 5。趙甚至批評把信仰視作「假定」的人是「現代的妥協派」，結果就是「不冷不熱，不死不生」。（頁 6）

[114] 在題爲〈一條窄而且長的路〉、〈今日中國的青年還該學耶穌麼？〉、〈一個導師隨意爲一個青年作社會福音的小註解〉、〈現代人的宗教問題〉四篇文章中，趙通過甲、乙兩位基督徒的對話，探討了基督教如何救國、怎樣學效耶穌、現代人與基督信仰的關係等課題。在這一系列文章中，反映出趙對科學及哲學的不滿，確立了基督徒並非迷信的認信，也同時批評了屬靈派基督徒的成見。參《真理與生命》，第 8 卷 3 期（1934 年 5 月），頁 105 至 113；第 8 卷 5 期（1934 年 10 月），頁 228 至 239；第 8 卷 8 期（1935 年 1 月），頁 412 至 423；第 9 卷 1 期（1935 年 3 月），頁 20 至 29；第 9 卷 2 期（1935 年 4 月），頁 75 至 85；第 9 卷 4 期（1935 年 6 月），頁 192 至 204。

[115]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1、72。

[116] 趙紫宸：〈上帝若爲萬能而又愛人，爲何不將魔鬼或罪惡撲滅？若爲鍛鍊世人，豈不太忍心麼？〉，《真理與生命》，第 10 卷 6 期（1936 年 11 月），頁 336。

在「學識的路途」上探求宗教的正解。[117]例如他在英國時，曾應邀參加牛津團體運動（Oxford Group Movement）的家庭聚會，各團員當眾認罪，訴述經驗，及各自靜聽上帝的指示。當時趙的感受是：「心雖虔默，而理智卻躍躍然傾向於觀察」，並坦言自己沒有聽見上帝的指示，因爲在靜默時，「我不禁窺測同座者的行爲」。[118]他深深體會到「學識生活」（intellectual life）比「道德生活」（moral life）困難，卻能引領他獲得某種成就。因此，學識問題持續不斷困擾著他，成爲其掙扎所在。[119]三十年代末，他這樣形容自己：

> **知識追信仰，卻是在自己圈子裡轉，轉得果然快，但所追的是自己的影子。十年以前我就對自己說：「信仰沒有憑據，信仰本身即是信仰的憑據。」可是我的信仰依然是學府式的。**[120]

三十年代以還，趙紫宸的寫作充分反映出這種張力與掙扎。一方面，從《評宣教事業平議前四章》（1934）及其對吳雷川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的評論（1936）中，可見他對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的極大關注，在神學思想上呈現擺脫自由主義的痕跡與傾向，表達出對新正統主義的認同，堅持除了耶穌基督的啓示外，人不能按其理想來認識上帝。[121]另方面，他在《耶穌傳》（1935）中，卻又以人本主義色彩來詮釋耶穌，把他曾一度承認耶穌的「超越性」也全然揚棄。[122]《耶穌傳》迄今仍被視爲趙氏自由主義神學的典範。[123]

趙紫宸對啓示的理解，也反映出其徘徊立場。三十年代開始，他已開始強調啓示的重要。「宗教重知識理解，而尤重啓示與悟入」。[124]一九三八年，他出席在印度馬德拉斯（Madras）鄰近的坦巴蘭（Tambaram）召開的國際宣教會議時，便宣讀了〈論啓示〉（Revelation）一文。他一方面承認基督徒要在耶穌基督身上「尋找上帝特別的啓示」，而這啓示是有別於上帝在自然界、人類歷史及在非基督宗教的啓示。另方面，他又相信古代中國的聖賢，也可以受到上帝的啓示。[125]這反映出他在接納特殊啓示的同時，又保留了一些自然神學的影子。

---

[117]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3。

[118] 趙紫宸：〈牛津團體運動〉，《真理與生命》，第 8 卷 1 期（1934 年 3 月），頁 10。這時，趙對於個人如何領受上帝的指示，仍有一定保留。他說：「人將自己的想像當做上帝的引導，一涉錯誤，豈不使上帝負吾人謬想的責任麼？且人又如何知道此思想是由上帝來，那思想不是由上帝來。」（頁 11）

[119] T. C. Chao, “What Jesus Means to Me,” 13.

[120] 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吳耀宗編：《基督教與新中國》（上海：青年協會，1940），頁 165。

[121] 趙紫宸：《評宣教事業平議前四章》（北平：燕京大學宗教學院，1934），另趙紫宸：〈「耶穌爲基督」——評吳雷川先生之《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第 10 卷 7 期（1936 年 12 月），頁 412 至 428。詳參邢福增：〈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思想的中心課題〉，頁 24 至 33。

[122] 趙形容《耶穌傳》是一本從「本色玻璃」來看耶穌的著作。趙紫宸：《耶穌傳》（上海：青年協會，1935），頁 3。後來，他形容自己寫《耶穌傳》，「純係文藝的寫作，一任想像的轉移，行文施墨，全無羈束」。參趙紫宸：《聖保羅傳》（上海：青年協會，1947；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6），頁 16。

[123] 《趙紫宸文集》收了《耶穌傳》，在編者按語中，形容此書「充分反映了趙紫宸先生早期自由主義神學對於道德人格的強調」，參《趙紫宸文集》，第 1 卷，頁 450。

[124]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34），頁 73。「我深覺基督教之所以爲宗教，是因爲耶穌的信仰與啓示」。

[125] T. C. Chao, “Revelation,” ***The Authority of Faith***, The Madras Series,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9), 32, 42-43.

五 .「我被逮住了」

尋求活的信仰

有謂「物極必反」，回看趙紫宸在宗教方面的經驗及思想演變，當發現每一次他向理性及學識方面追逐到高峰後，即會出現思想逆向，作出深切的自我檢討與反省。二十年代中葉他在完成兩本自由主義典範——《基督教哲學》及《耶穌的人生哲學》後如是，三十年代中葉《耶穌傳》出版後的反省亦可作如此觀。

三十年代末，趙的思想又作出了深刻的反省。他坦言：「去年一年（筆者按，即一九三九年）我尋求信仰，要一個活的信仰」。他的掙扎是：

> **在理智上我肯定我信上帝；然而到了患難之際，我依然惶急，不真實地依賴上帝。這樣，我的宗教祇是信念，而不是信仰。因此，我懇切尋求；用讀書的方法，用理解的方法，不息的尋求。每一次努力，我所得的不是信仰，而是知識，我加增了知識，並沒有增加了信仰。我明明知道知識不是信仰。我便恍然徹悟，我自己有力量得知識，沒有力量造信仰。信仰是上帝的恩賜，是由上帝賜與尋求的人的。我惟有誠服投降，自己毫不能動擅，毫不能為力。我的靈修，便變了交託，除此以外，更無救法。**[126]

顯然，趙對於自己單純在信念上的認信並不滿意，而是更深地渴求要在生活中學習交托及依賴上帝的功課。在這方面，趙作出了深切的懺悔：

> **我所引以為慚愧的是：我雖然做了三十餘年基督徒，我的信仰還沒有堅如金石，我還沒有成為一個純粹的基督徒。……我自覺私心太盛，冒險的精神，依賴上帝的澈底投靠心，都不充足。……不是上帝不能使我完全變化氣質，乃是我自己猶豫自傲，不肯單純地將自己交託給他。**[127]

趙覺悟到除非自己徹底揚棄「依靠學術」、「把知識認作信仰」的舊路，否則他永不能得到宗教的「正解」，要信就必須要「冒險」。知識「不能執住超乎知識證據的信仰」，信仰就是超乎已有經驗與事實的真際。活的信仰就是「靠賴」和「無恐怖的放心」，而這卻完全是上帝的恩賜，「由人的懇求而加給人的，不是人自力所能致」。[128]

這時，趙紫宸特別喜愛《新約．希伯來書》所言：「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11 章 1 節）。他說：「這個實底與確據，就是我所切求的。求之不得，我恐懼憂惶，如今好像一個學游泳的人，漸漸的放心，浮在水面上，不管身底下的水有幾萬丈深，確像是在信仰中得了實底與確據」。[129]

一九四〇年四月，趙紫宸在成都跟金陵神學院師生主持一系列的講座。[130]趙第一講

---

[126]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3。
[127] 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頁 161。
[128] 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頁 165。
[129] 趙紫宸：〈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頁 177。
[130] 抗戰後，金陵神學院分別遷至上海及四川成都成立分部。

就是探討知識、經驗及信仰的關係。他強調，了解知識及分析經驗，均不能使人得著信仰。因爲「宗教根本不在乎信識，乃在乎經驗中所產生的信仰」，這是一種「超乎經驗以上的信仰」。換言之，人不可能藉著知識與經驗來爲信仰找到憑據？他再次引用上述希伯來書的經文來闡明信仰的意義。然後他說：

> **亞伯拉罕的遷移離開本鄉，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榜樣。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我們的信仰就有憑據。信仰如同一個人站在山峰上向山谷裡跳下。忽然在半空中有一隻手托著了他。一切生活的結果，就是信仰的憑據。信仰就是冒險的前進。一個有信仰的基督徒，一定要比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不同。這個不同在困難危險和痛苦中看得出來。信仰可以變化行為，行為可以提高信仰。神學的根本就是信仰。**[131]

職是之故，趙紫宸完全拒絕把上帝局限於經驗及現象世界內，[132]他對啓示的理解又有了更深的體認，承認基督教是個啓示的宗教，「先要相信而後知道」。他全然的接受耶穌基督的特殊啓示，是上帝最重要的啓示，並且再一次宣告：「信仰本身就是憑據」，沒有啓示就不能認識上帝。[133]

趙的覺悟自然對其修養工作也有影響。他承認基督徒的靈修是「對越上帝，聽上帝向他說話」。每個真心尋求上帝的人，都不能用其他辦法，來代替讀聖經及祈禱。[134]他以爲，若沒有祈禱生活，也就遑論有宗教生活可言。祈禱就是信徒與上帝的交通，在人有缺欠的時候，難免藉著祈禱來「求福、求壽、求財、免難」，但這卻只是「最低級的，最簡單的祈禱」，並且容易引起人的「自驕、自倖、自私自利的心理」。他仍相信，祈禱的重要，在於求上帝旨意的成就，並且藉著祈禱來維持與上帝的關係。趙反對「人本主義」式的祈禱，意思是「十分重自修自省的工夫」，而忽略了「對謁上帝」。現代人會懷疑祈禱是否人自言自語的默想，他的經驗是：

> **我個人的經驗中，有時因為特別困難，自己所想的和別人的話都不能使的滿意；然而在祈禱之中，忽而會覺得我所說的就是上帝的回答。於是我就照著我所明白的最高理想去行。我祈禱是對上帝，而不是對自己。古今聖者祈禱的動機和內部，不是要和自己說話，乃是要和上帝說話。**[135]

上述一段說話，相信絕不會出自昔日趙紫宸的口中。因爲他仍不能從理性上說明祈禱與自我默想的分別。他曾經質疑如何能聆聽上帝的話，惟至今仍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他的改變，與其說是他找到任何合理的解釋，毋寧是出於其信仰上得著的新覺悟。他承認自己昔日受科學及心理學的影響太深，「實在狠狠的在我心裡下了一服毒藥」。他明白到，心理學只能研究心理現象，而「絕對不能肯定我的祈禱有沒有上帝聽」，這全然是宗教信仰的領域，科學無置喙餘地。科學原則就是以物釋物，故科學不講上帝，科學不足以成爲宗教的障礙。「我到了現在，自以爲明白甚麼是科學，甚麼是哲學，掙脫了牠

---

[131] 趙紫宸講，羅定興等合記：〈趙紫宸博士演講錄〉，《金陵神學誌》，21 卷 5 期（1940 年 12 月），頁 334 至 336。

[132] 趙指出，大自然及詩不能代替上帝。相反，人若有信上帝的心，卻可藉著大自然及詩來作修養的工作。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0。

[133] 趙紫宸講，羅定興等合記：〈趙紫宸博士演講錄〉，頁 337 至 338。他仍承認上帝在人類中的普遍啓示，如歷代聖賢豪傑，但卻明確指出，這些並不能幫助人完全認識上帝。（頁 338）

[134]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0 至 21。

[135] 趙紫宸講，羅定興等合記：〈趙紫宸博士演講錄（續）〉，《金陵神學誌》，22 卷 1 期（1941 年 3 月），頁 54 至 56。

們的羈絆，可以自由自在地祈禱崇拜，作我內心所需要的靈修」。[136]

同時，趙對讀經又有了新的覺悟。他自嘲曰：

> **我覺得讀別的書比較容易，祇有讀聖經最難。在讀的時候，我無論如何熱心，依然不免懷疑而批評，而不懂經句中的真意思。歷史的批判，科學的研究，好像害了我似的，使我不能直截了當地信受，純粹澈底地享用。我讀聖經，非有專藉的指引不可。其實，這並不可以為訓。許多信徒誠心讀經，把不懂的地方擱在一邊，把了解的章句當作靈糧，受益要比我多的多。**[137]

趙並不反對歷史及科學的方法，但卻提出「宗教的虔心」的不可或缺性。如此，便能藉著聖經來明白上帝的話與指示。[138]

這樣看來，趙所重視的靈修雖然有其神秘性，但卻又不局限於這種「超凡」的經歷內，而是因著靈修而領受及遵行上帝的旨意。同時，趙更前所未有地把靈修置於教會之內，他說：「我的修養不能純是個人的事。上帝對我說話，便是對教會說話。所以我若要真的修養，我必然要與信眾一同崇拜上帝」。離開了「做禮拜」，便算不得真有心靈的修養。教會若沒有修養的基礎，也遑論建立「精神的團契」。[139]

認信權威

促成趙紫宸在三十年代末對「活的信仰」的渴求，據他的自述的背景有兩方面，一是受到歐洲神學的影響，二是「受了自己實際需要的驅策」。[140]前者顯然是新正統主義對「超越」與「完全的另一位」（the Wholly Other）上帝的堅持與肯定。他覺悟到，那些意圖用科學與哲學的權威來改造信仰的做法，壓根兒是「混亂的神學」（a mess in our theology），只會對教會帶來破壞。[141]有關這方面，上文已有論析，在此不贅。

至於「實際需要」方面，相信與趙在現實生活面對的問題有關。他承認自己是在「難問題」驅使下，才來到上帝施恩座前。「我感謝上帝，要是沒有問題追迫我，像我這樣安於逸樂的人，怎會去緊束自己的心靈？而不緊束，豈不使我淪落麼？」對此，他稍稍提及了兩個的問題：[142]

第一，是他仍面對許多「不能免除的試誘」。他沒有具體說明試誘的內容，只是突顯其屬於內心的情緒、欲念及思想方面的試探。當這些試探臨到時，內心有著極大的掙扎，「或是怕懼驚惶，不能自持，或是糊塗隨便，不能自制」。因著這些實存的試誘與張力，趙確切體會到「心中切需一個管制，一個權能」。而上帝就是唯一可以管制人心，使人不致動搖的規律。每當試探來到時，「我必須要這個主宰，清楚地實顯在心裡。若

---

[136]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1。

[137]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1。

[138]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3。

[139]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3 至 24。四十年代趙紫宸神學的重要突破，也在其教會論方面可見。參邢福增：〈趙紫宸的教會論——兼論其在中共建國後的教會改革觀〉，氏著：《尋索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132 至 156。

[140]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2 至 23。

[141] T. C. Chao, “Have We Done Justice to the Church?” in ***Chinese Recorder*** LXXII:10 (Oct., 1941): 529.

[142] 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2。

是在這一點上糊塗，我便跌倒了」。而要強化內心的信仰力量，便更需要在靈修方面作「精修」與「苦修」的工夫。「唯一方法，就是以心攻心，不是以自心攻自心，乃是以上帝之心攻我之心」。

第二，是趙生活上的處境切實驅策他做修養的工夫。例如他在神學教育的職事上，需要回答許多青年人的問道。他有宣傳道理，講解福音，主理崇拜的責任。「若不用力與上帝親近，我如何擔負傳道解惑的責任呢？」同時，三十年代以還，國難逼切，復加趙氏身處北平淪陷區，他內心也「憂心如擣」。憂愁愈多，「我愈需要上帝的救助」。

在四〇年十一月底爲燕大宗教團契撰寫的小冊子——《近日我對所信的發現》（***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中，趙紫宸進一步流露出前所未有的認信心態。他在開始時描述了一幅極度混亂、無奈及痛苦的現況：

> **一切盡是黑暗。百萬計的生靈塗嘆，或死亡，或痛苦。我們目睹人類文化的崩潰。自由的思想被困在鐵籠之中。撒旦的勢力把信仰（faith）解體成信念（belief）。人類創造了價值，卻又將之破壞。一切都是相對的，今日的「是」成為明日的「非」，除了自私之外，再沒有審判的標準。沒有甚麼是絕對的，因為一切都取決於欲望的滿足。政治與國務事務中，錯誤的方法看似比真理更有效。整個世界回到混亂之中，好像深不可測的深淵，毫不後悔地把人類及其價值吞噬。敢問：在這樣的世界中，我們還可相信甚麼呢？**[143]

趙覺悟到，在變幻與相對的挑戰下，他更需要確認永恆的真理（reaffirmation of eternal truths），就是那基本的信仰（fundamental affirmations of faith）。[144]

在接著的篇幅中，趙便對基督教基本信仰作出認信。這包括：

一、創造天地，掌管權能與萬有的上帝；
二、道成肉身的基督，藉基督啓示上帝，並且帶來救恩，使人與上帝的關係得以復和，最後使人免於死亡的威脅；
三、上帝差派聖靈，叫人知罪、悔改，並賜予力量，安慰人心，導人成聖；
四、人的罪性與無能，唯有信靠基督，始能得救（趙公開宣告十九至二十世紀西方肯定人性樂觀的思想是錯誤的）；
五、教會群體在世上的意義與作用，並在上帝恩佑下，維持及傳揚信仰；
六、民主政治爲最符合基督信仰的價值。[145]

在小冊子的最後，趙紫宸再一次宣告，他不再追求新的信念，而是認信與肯定舊的信仰：

> **我的信仰是我們不需要新的信念，作為基督徒的我們，面對今日世界的需要，更強烈地需要重新肯定舊有的信念，因為這是永恆的真理。**[146]

一九四一年七月，趙紫宸毅然接受牧職，由何明華會督（Bishop R. O. Hall）在香港

---

[143] T. C. Chao, ***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 (Peiping: Yenta Christian Fellowship, 1940), 1-2.
[144] T. C. Chao, ***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 2.
[145] T. C. Chao, ***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 3-9.
[146] T. C. Chao, ***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 9-10.

替他按手，按立他作聖公會會長。宗燕京教學院畢業生駱振芳憶述趙曾對他們說：以前總是走個人追求信仰的道路，有些問題想不通就增加許多苦惱。後來受了聖公會聖職，在信仰上接受教會的權威，這樣可以解除許多思想矛盾和苦惱。[147]何明華亦憶述，趙接受按立前嘗言，他接受牧職不僅是期望「加入聖品」（in orders），而更是希望「順服聖品」（under orders）。[148]趙把以前常高舉的一句話——「人生是友誼」修改爲「人生是聖禮」。聖禮是用有形的事物來象徵無形的屬靈的實在。他常把這句話掛在口邊，即是說：人生有形的生活雖屬平凡，但卻有更深的屬靈意義，平凡的人生可以被「聖化」，關鍵是上帝把豐富的恩典賜給人，注入信徒的平凡生活之中。[149]

苦難經歷

在《近日我對所信的發現》這小冊子中，趙通過基督的受苦，而進一步思想到苦難對基督徒的意義：

一、 苦難的管教作用；
二、 苦難是罪的結果，具有懲罰作用；
三、 苦難是效法基督的自我犧牲精神，提昇人的價值。[150]

如果上述的體會僅是理念層面的話，則趙很快便遭遇到一次重大的痛苦經歷，讓他親身在苦難中作出思考及反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揭開太平洋戰爭的戰幕。由於日本與美國的敵對關係，華北各地的基督教會學校、醫院和團體都被日軍封鎖。北平市內所有英美系中小學校，悉數被日軍接收。燕京大學方面的處境亦十分嚴峻，珍珠港事變數小時後，日軍便包圍校園，趙紫宸、張東蓀、陸志韋、洪煨蓮等十一位教授被捕。趙氏被日軍囚禁，直至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始獲釋放，獄中生活合共一百九十三天。

有趣的是，趙紫宸在獄中經歷了五次特別難忘的夢境，後來他到記在《繫獄記》內。[151]下表輯錄了這五次特殊夢境的內容，以及趙所作的解釋（底線爲筆者所加）：

	夢境內容	趙的解釋
一	「夢見自己穿了細白夏布大掛，手裡拿著一頂傘，走在露天，一傍是房屋，一傍是板牆，牆自西往東，折爲直角而向南，不見盡頭。自北而南的板牆之外，有許多人站著，其中定珍卻毫無遮蔽。正想著，我就醒了……」（頁 7）	「我想到出獄的時候不遠了，因爲我在牆內，定珍在牆外等著我，只須拐一個灣，就是出外的門路。我想錯了；因爲拐灣是必須的，門路卻沒有看見。後來被解到日虜軍獄裡去，纔知是拐灣；而得開釋，卻是遙遙無期的。再後來我出獄的日子，身上穿的是白夏布長衫，真是奇妙。……<u>我並不信夢，而</u>

[147] 駱振芳：〈懷念趙紫宸先生〉，《天風》，1988 年 4 期，頁 26。

[148] David M. Pat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Bishop Ronald Hall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and Marco and the Hong Kong Diocesan Association, 1985), 104.

關於趙紫宸與何明華的關係，參邢福增：〈趙紫宸的教會論——兼論其在中共建國後的教會改革觀〉，136 至 139。

[149] 駱振芳：〈趙紫宸先生神學思想中的智慧〉，氏著：《弘道集》（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文字工作室，1999），頁 146。趙曾說：「聖餐崇拜是教會崇拜的總活動。教會行這聖禮的時候，我們看見聖壇上餅酒，象徵上帝的臨在，道成肉物，自生至死至復活，戰勝罪惡，制服苦難，成全救法，建立天國的全部生命。在其中上帝向人說話，人向上帝稱頌，心靈裡說：『榮耀歸於至高之上帝，在地上平安，人間有善意』。」趙紫宸：〈談談我的心靈修養〉，頁 24。

[150] T. C. Chao, ***What Do I Find Myself Believing These Days***, 4-5.

[151] 趙紫宸：《繫獄記》（上海：青年協會，1948）。

		每逢疑難，必有夢中的指示，豈冥冥中上帝的指示，可由夢而開展麼？豈我荏弱，上帝特由此路，而鼓勵我麼？科學家竟可以全作心理作用講麼？」（頁 7）
二	「一月十日…我做了一個奇夢，夢見我浙江新市鎮的祖屋天井內。天井之南，有一對黑漆大門。我走出大門，大門就被關閉了。但是大門之外，還有一個小天井，其南也有一對牆門，牆門是閉上的。在這小天井裡，我見先父正在一個浴盆中洗澡，他見了我，就從浴盆中起來，直立著；忽然頭眩欲倒，即用手按額上，大聲說，『我站穩了。』言猶在耳，我即驚醒，樓上的自鳴鐘即打了十二點。」（頁 9）	「我不知所指，只知先父即是天父上帝的象徵，特意來指示前途。……我的夢是有意思的：出大天井入小天井，是出憲兵隊到軍獄，先君洗澡，是暗示我在軍獄是受精神上的洗濯，說『我站穩了，』是鼓勵我，教我堅持立場，不受威脅而示弱的意思。人情貪安懼危，好生惡死，我受此鼓勵，切念不忘，乃是冥冥中賜予的恩惠」。（頁 9 至 10）
三	「三月初…那天晚上我得了一個夢，夢中聽見外邊叩門的聲音，極清楚，極響亮。直到現在我還好像聽得見。我問是誰，外面屋子裡有一個女子的聲音，也問是誰。好像定珍正在問是誰。叩門的沒有答應。我從內屋裡走出來，進了地面的屋子，而向右轉，進了第三間，好像是在樓上。第三間北向有門，我轉動門軸，將門拉開，外面還有一重紗門。紗門之外，站著先父的形像。當時是嚴冬，他頭戴玄色風帽，身穿黑馬掛，藍長袍，面色黧黑，形貌莊肅，站著默無一言。門外好像還有一樓梯，他好像是從樓梯上上來的。我開了板門，他開了紗門，很肅穆地走進來。他向裡面走，我面對著他向裡倒退，進了外屋，而進了內屋。我忽然醒了。」（頁 27 至 28）	「我仔細尋思，上帝果然借了人所能見能觸的形狀來向我啓示他的真在。先父是上帝的象徵，體服整齊，是上帝的莊嚴，容顏黧黑，是他的焦勞，面色慘淡，是他的憂愁。無言無語，又是他的了解。然則他爲甚麼焦灼嚴肅呢？我當時有三個理由，第一是我正受難，又有病痛，他表示痛惜愛護的意思。第二是我的事情有些嚴重，他要表示憂慮。第三是我不當求自見無形無像的上帝，更不當試探上帝，我不當毫無信心。所以他表示不歡喜。但是天恩浩蕩，他至終答應了我的呼求，要我信，不要我疑；他的顯現，如同耶穌復活之後，顯給多馬看一樣。我心中充滿了感謝，從此，知道上帝是與我同在的。」（頁 28）
四	「四月中旬…那夜我又得了一個夢，夢見身在故鄉的家裡。我家宅後有一小屋，朝北一排三間。東邊一間，有一扇向西的門，門外有一扇矮門。我在那間屋裡，聽見外面有人，將矮門一推，矮門就開了，好像是向外可以開，向裡也可以開，門鍵是彈簧做的。臺階之下，先父站著，說道，『我好容易到了大麻，現在又回來了。』大麻是浙江的小村鎮，我年幼的時候常去探望親戚的。先父又說『阿潔要來了。』他剛說著，我見一個僕人，雙手托著三層一疊的衣裳，推進門來。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第一層是湖綠色的，第二層是白的，第三層是藍的。正看的時候，我就醒了。」（頁 63）	「我細細地想，知道上帝對我有所指示，家中必快要送衣裳來。至於大麻，也許我們的事情是大有麻煩的，可是上帝已經到過大麻，已經回來。我們在軍獄已經是兩個月了，以一半路程計算，至多不過再受兩個月苦，就可以出獄了。因爲我想到大麻是一半路程，大麻回來又是一半路程。若估計我們在軍獄裡已過了一半時候，不算在沙灘的時間，那末大有麻煩的一半還在前頭。可是矮門不是獄門麼，表裡俱可開，不是已經等於開啓了麼？當時我一想就作這樣的解釋。後來我們出獄的日子，果然是六月十八日，果然是兩個整月之後！到了四月二十日下午，囚室的門洞開了，洞裡塞進來三種衣裳，一件夾袍子是藍綿綢的，一副裏衣是白針紋的，一副夾襖袴是湖色縐紗的，與夢中所見絲毫無差。我心中大得喜慰，不住地感謝上帝。夢是這樣的，應驗又是這樣的，天地間神奇的事，我不能在宗教之外找尋解釋。（頁 63 至 64）」
	「六月八日…晚上我在夢中看見自己坐在一個巨大的爐灶面前，灶是長方的，前邊有洞，	「我想夢是清楚的：是受審問，好像對灶而坐，被火衝著。火上覆煙，是事實上加上捏

五	洞裡冒出火來，火上頭蒙罩上一層濃而厚的黑煙。火越冒越近我的頭頂,煙在火地上也越來越黑而濃。我覺得被火衝著不舒服，便走開了，向右走，見靠牆有一排椅子，每兩隻有茶几隔開；椅子盡處有一排小爐灶，我走過的時候，這些爐灶裡卻冒出不罩黑煙的火燄來。我到椅子那裡，就坐下，看見有的已有人坐著，有的還是空的。後來不知怎樣，我也醒了。」（頁 73 至 74）	造；火近身而我走開，是受審而得自由的意思。小爐灶是同難的朋友們，我經過而冒火，是他們因我而聽福音，心中有所信受的意思。火光微小是他們受感不深的意思。椅子是學校講座，我得坐下是我將來可以回校，擔任功課。這是我自己的解釋。到如今這一切的一切，都已應驗了。」（頁 74）

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指出，夢境在趙紫宸宗教經驗的深化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早在其信主初期，便對夢境表現了既愛又恨，後來思想進一步反動，則將之一概斥曰迷信。不過，這次他身繫獄中，卻重新肯定夢境的意義，並且不再動輒以科學及心理學來作解釋，而將之視作上帝的指示。正如他說：「我並不信夢，而每逢疑難，必有夢中的指示，豈冥冥中上帝的指示，可由夢而開展麼？豈我荏弱，上帝特由此路，而鼓勵我麼？科學家竟可以全作心理作用講麼？」[152]

要明白趙紫宸這種轉變，先要了解他在獄中所面對的困擾。他在獄中常遭日軍審問，又被單獨囚禁，爲疾病煎熬。此外，他又切切記掛著在監外的妻子（童氏定珍）及兒女，加上國難當前，令他飽受精神及身體上的痛苦。特別是在單獨囚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心中空虛」，人雖活著，如同死了。爲了避免「孤坐無聊」的害處，他每天都作自省、默想經文、代禱及禱告的操練，「使心靈有事可作」。這樣，他不斷求問上帝的「真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 **我自言自語地說，我獨在此地，守衛不以我當人看待，自然不能與他發生人的關係。好在我有上帝同在。猝然間我又覺得願意將上帝摸著，要他的手放在我手裡，使我曉得有倚靠，毫不孤單。但睜眼一看，毫無動靜。我就祈禱說：上帝，你在這裡麼？你是真的麼？若真有你，那末在痛苦之中，你必定要老老實實地叫我知道你在這裡。若是我能知道你果然是在這裡，那末死也甘心，或生或死，於我都有裨益。**[153]

趙確切要求在苦難中尋見上帝，就在那天晚上，他在夢中見到逝世的父親（夢境三）。他認定，這就是上帝「借了人所能見到觸到的形狀來向我啓示他的真在」。「我心中充滿了感謝，從此知道上帝是與我同在的」。[154]事實上，從上表可見，趙三次夢境中所遇見的父親，即代表上帝的臨在與指示。牢獄之苦難，逼使趙去尋求上帝，「我不能出牢門去尋求上帝，只有上帝到獄室裡來尋找我，纔能使我與他發生關係」。一切的理論都沒有意義，唯有上帝的真在是真實的，「把我尋得而逮住」。[155]

毋庸置疑，當趙在牢獄中面對苦難時，基督教信仰成爲他極大的幫助。他嘗言：「宗教信仰足以穩定心志，抵禦憂惶」。[156]祈禱也成爲他在獄中最大的力量來源，「細想一日之內，上帝如何引導我，答應我的祈禱，一件一件的思念，爲此而獻上感謝的心。有時

[152] 趙紫宸：《繫獄記》，頁 7。
[153] 趙紫宸：《繫獄記》，頁 25 至 27。
[154] 趙紫宸：《繫獄記》，頁 27 至 28。
[155] 趙紫宸：《我被逮住了》（上海：青年協會，1950），頁 8 至 9。
[156] 趙紫宸：《繫獄記》，頁 18。

我看不出上帝的引導，以為上帝從前既有殊恩，步步引導，今後亦必要引導我到底。上帝若要用我，他必定要將我保全，我若能感覺到使命在身，自然能彀天君泰然。」[157]當一同被囚的朋友灰心喪志時，他又以宗教來安慰他們。[158]

職是之故，趙紫宸覺悟到自己從前「服從科學態度，理性主義而執持的宗教」，實在是「借宗教的名行道德的事」。昔日燕大雖有自由空氣，但「人們不與上帝相親，單光講講友誼，講講服務，討論來，討論去，在自己的圈子裡旋轉，而自滿自足，不知道祈禱崇拜是甚麼一回事；那裡真會有甚麼宗教！」由此，他體會到若強要用宗教尋求科學正解，最後只會把宗教也「抹殺」：

> **我看見自己十年來思想的變遷，居然到此悟入了我所需求的，聖經早已說明的真際。**[159]

趙在獄中，立志在出獄後作三件事：一是休養身心，恢復本元；二是著作書籍；三是「當然要幫教會，使教會自立自養自傳自理，成為中國本色的，不靠外人的教會」。[160]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趙紫宸在被牢一百九十三日後獲釋，他雖獲釋，但從四二年中至四五年抗戰勝利期間，他的生活條件顯然並不理想。北平淪陷期間，教會活動受日本人監控，成立了「華北中華基督教團」，要求所有教會加入教團。[161]由於與華北教團有聯繫的教會難免有與日方合作之嫌，故趙氏並不欲參與其中。他自述在這數年間即使面對失業、貧窮及種種痛苦，但仍絲毫不與日方合作，也從未從日本人中獲得一分一毫。他只專心讀書、講道及寫作。[162]查當時趙獲華北中華聖公會會長凌賢揚收容，寄居於北平聖公會範圍。聖公會當時已參加華北教團，凌賢揚更擔任教團常委及經濟組組長，但相信趙氏並非受職受薪，以避親日之嫌。他與凌氏私交甚篤，常一起討論教會問題，凌又邀請他為教會工作人員講授「使徒時代的教會」及「聖保羅的生平與著作」。期間趙完成了《基督教進解》及《聖保羅傳》的書稿。趙特邀請凌氏為《聖保羅傳》撰序，又在導言中感謝凌的照顧：

> **凌賢揚會長使我安居於華北中華聖公會範圍之內，幽僻安閒，不知世亂如蟣蝨，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又使我指導會中高下職員，研究開教史，學習聖保羅的書翰，我逐愈講愈明，日有所得；書成之後，又為我作序，獎勵之誠，真可感也。失業之人，貧窘可知，家無僕婢，老婦獨任操作，借錢售物，供我飽餐，其援助何等的可貴。**[163]

我們可見，從復員以迄新中國成立前後，趙共出版了專著十二本，成為他神學創作的高峰期。這些著作主要關注六方面的問題：（一）本色化方面，如《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1946）；（二）教會論方面，如《教會的體用及其必要性》（1946）、《基督教教會的

---

[157] 趙紫宸：《繫獄記》，頁 25 至 26。

[158] 一九四二年元旦日，他忽覺心中感動，乃轉向眾人說：「我奉上帝之名，向你們宣告我們終必得到自由」。眾人因此而得感動，「我深深地覺得上帝未曾離棄我們」。趙紫宸：《繫獄記》，頁 23。

[159] 趙紫宸：《繫獄記》，頁 52，64。

[160] 趙紫宸：《繫獄記》，頁 76。

[161] 有關華北教團的情況，可參邢福增：〈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淪陷時期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建道學刊》，第 17 期（2002 年 1 月），頁 1 至 56。

[162] T. C. Chao, “From China,” in ***Vanderbilt Alumnus*** 31:6 (June 1946): 36. Special Collection & University Archives, Jean & Alexander Heard Library, Vanderbilt University.

[163] 趙紫宸：《聖保羅傳》，頁 17；凌賢揚：〈序〉，《聖保羅傳》，頁 4。

意義》（1948）；（三）教義神學方面，如《基督教進解》（1947）、《神學四講》（1948）及《我被逮住了》（1950）；（四）基督教倫理方面，如《基督教的倫理》（1948）、《基督徒的職業召命》（1948）；（五）新形勢下教會革新方面，如《中國基督教教會改革的途徑》（1950）、《審判之下教會的革新》（1950）；（六）其他，如《聖保羅傳》（1947）、《繫獄記》（1948）。

可以說，趙紫宸在宗教經驗方面的深化，雖然增加了不少神秘生活的成份，[164]但是卻沒有把趙引導至個人信仰的方向。他之尋見上帝的「真在」，反倒更讓他與教會的關係，變得更密切，[165]而他對基督教與中國社會及文化的關係，亦有了更深入的反省。[166]

我被逮住了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間，趙紫宸的主要精力均用於探討基督教如何改革自身以回應政治社會大變局的來臨。[167]同時，他對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的發展，也表達了高度的關注。他覺察到在新形勢下，基督教不能不接受共產主義的挑戰。他說：

> **當代的思想，無論其真不真，錯不錯，是有活命的，是發生效率的，是漸漸地為多數人所信服的。自然科學的觀點看，馬列的思想有作用，有正確性。我們若把握住宗教自有的範圍與境界，曉得我們的宗教思想並不是一個上層的建築，一個意識的形態，我們就不必有任何的不放心。**

中國的神學工作者既要學習與新思想「調和」，也要堅持自身的「獨立」。[168]

趙思想到，面對無神論的衝擊，許多基督徒都關心如何實證上帝的存在（有神論）。他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次燕大團契的禮拜講道時，便據詩篇 139 篇，分享了他在這方面的體會。他明確指出，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雖則相反，但卻犯上相同的錯誤，就是以爲可以用「理知」來論證上帝的存在與否。趙反問：「知識能證實信仰呢，是信仰能維持知識呢，人們就不至於那末傻了。知識的密網能網得著上帝麼？如果網不著，就算證明了上帝的不存在麼？」[169]

按著趙氏四十年代以來的自身覺悟，他相信人不能證實有沒有上帝，人只是尋求摸索，「在無可奈何之時」，得著了信仰的「恩賜」。他說：

---

[164] 一九四七年他接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時，曾自題一詩，其中自稱「宗教之中神秘者」。參趙紫宸：〈普林斯登大學舉行二百週年紀念禮授我榮譽博士學位〉，《天風週刊》，第 79 號（1947 年 7 月 12 日），頁 14。

[165] 古愛華（Winfried Glüer）以「教會神學」來概括趙紫宸在四十年代的神學建構。參古愛華著，鄧肇明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頁 233 至 265。

[166] 參邢福增：〈尋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自由神學以後的趙紫宸〉，氏著：《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63 至 91。另〈趙紫宸與共產主義〉，《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93 至 121。

[167] 關於趙氏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教會改革主張，參邢福增：〈趙紫宸的教會論——兼論其在中共建國後的教會改革觀〉，氏著：《尋索基督教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頁 156 至 178。

[168]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金陵神學誌》，第 26 卷 1、2 期合刊「金陵神學院四十週年紀念特刊」（1950 年 11 月），頁 17。

[169] 趙紫宸：《我被逮住了》，頁 1。

> **人不能把上帝逮住了，乃是上帝把人逮住了；上帝把人逮住，人乃在不可講不可傳的宗教的經驗裡覺悟到上帝的實有。我自己感覺得要用理性來講得人，講得自己信宗教，是不可能的，是呆笨極的。可是我自己是信上帝的，毫無一點疑惑的，因為我覺得上帝時刻與我同在，沒有上帝就沒有我。我所可說的是在我自己的經驗裡生活裡，我被逮住了。**[170]

接著，趙從六方面來闡釋人如何被上帝逮住：

第一、 人在追求到絕境時，走到盡頭，經歷到「邊界局面」，確切認知到自己不能逮全上帝，始能在宗教生活中覺著被上帝逮住；
第二、 在苦難危險的閱歷中，人心向上帝，上帝就臨在；
第三、 在尋求真理的時候，經驗到絕對標準的重要，「我逮不住真理，卻被真理逮住」；
第四、 人在參與時代歷史的動程之中，在此時此地的努力工作時，經驗到「那超乎我的力量」，因而被上帝逮著；
第五、 人被愛所感動，不論是愛人或是被愛的經驗中，體會到上帝就是愛，而確信上帝的實有；
第六、 耶穌基督的啓示（道成肉身），使人看見那看不見的上帝。

趙深信，任何人若企圖去證明上帝的實有，「結果祇得到了一些空洞的論證」。中國神學工作者必須覺悟，上帝是超乎一切範疇的，「只有他逮住我們，沒有我們逮住他的道理」。[171]而這正正是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所要確立的理論根基，[172]也是中國神學家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與資格（「虔敬的，順服的信仰」）。[173]中國教會將要面對大變革之的時候，正在確切尋找其使命與任務的當下，更須對基本信仰的解釋有所掌握。趙氏最後的祈盼是：

> **到了今後四十年，中國教會已經因為縮小了範圍，加深了經驗，發生了麵酵的作用，一定可以吸引許多人到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前，也一定要看見人到宗教裡來尋求真理的標準，道德的根基，價值的保障，自我的實在，人生的意義，心靈的歸託。政權與科學所不能供給的，宗教已經保藏著，準備送給人。**[174]

六．結論

筆者在上文業已詳細疏理了趙紫宸從信教前以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宗教經驗，這對於我們進一步研究其神學思想，以至建構中國神學的反省，又帶來怎樣的啓迪呢？筆者認爲，有三方面的課題值得留意。

宗教經驗與神學思想的嬗變

首先，他在宗教經驗方面的調整，與其神學思想的變調也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他在宗教經驗方面的轉變，本質上就是他尋索信仰與上帝的實在（reality）的歷程。我們

[170] 趙紫宸：《我被逮住了》，頁 5。
[171] 趙紫宸：《我被逮住了》，頁 6 至 24。
[172]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16。
[173]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19。
[174]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21。

可見，影響其宗教經驗的因素，包括信仰及神學傳統（自由主義、新正統主義）、學術思潮（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中國文化）、國家社會處境（政治運動、國難）、個人遭遇（疾病、婚姻、苦難、師友關係、試誘）、神秘經驗（夢境）五方面。[175]趙在不同時期，因著上述因素的互動及消長關係，因而在宗教經驗上呈現出不同的關注與發展。

很多時候，我們爲了方便討論，往往以「三期說」的分式來解讀趙氏神學的演變：（一）自由主義神學時期；（二）新正統主義神學時期；（三）共產中國時期。[176]但是，「三期說」實際上只能反映其思想體系的大要，本身仍有其局限的地方，未能充分解釋其思想的發展與演變。從上文的討論可見，趙氏在宗教經驗以至神學思想方面的發展往往是充滿著張力與掙扎的。即使在二十年代所謂自由主義神學的高峰期，他內心同時有著不安與掙扎，也正是這些經驗下肇了其神學思想的變調。但即使在三十年代的所謂新正統主義神學時期，我們仍能發現部分殘留的自由主義痕跡，到四十年代以降他在信仰經驗上有更深的體會才逐漸淡化。他在基督論、救贖論以至教會論方面的突破，要到四十年代中葉以後始趨成熟。筆者相信，唯有明白趙紫宸在宗教經驗上的反覆性，我們才能更持平與恰當地去解釋及評檢其神學的意義與貢獻。

宗教經驗與基督教信仰的本質

其次，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問題。我們清楚可見，趙紫宸在宗教經驗方面的調整，跟他企圖爲基督教在現代社會建立相關性（relevance），確立其現代基礎，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他最大的關懷，就是：「我做基督徒，對於教內外的同胞，有甚麼宗教見解可說，有甚麼大道可傳？」[177]

若果我們把趙所關注的課題，置於更寬廣的歷史脈絡時，可見這其實是基督教在啓蒙運動以降所面對的挑戰。宗教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基督教在面對現代化的衝擊，特別是理性主義及科學主義對傳統的解構時，可以有三個不同的選擇：（一）重新肯定傳統（reaffirming tradition），例如基要主義及新正統主義；（二）揚棄不合時的傳統，爲基督教尋找現代的角色（modernizing tradition），例如自由主義；（三）以經驗取代傳統（from tradition to experience），例如士來馬赫（F. D. E. Schleiermacher）主張依靠經驗來確立信仰。[178]

趙紫宸在宗教經驗方面的尋索，顯然也沒有偏離上述的軌跡。他自從決定到蘇州接受新式教育伊始，便跟民間信仰分道揚驃。皈依基督教後，他過著「苦修式」的清教徒生活，經驗比理解對他有著更大的吸引力。不過，理性與經驗間張力逐漸在他身上出現，未幾他決定揚棄傳統教義，企圖通過解放思想來建立基督教的合理性。他承認在「反動」之餘，仍有「創造」的要求，不過，「反動是順流而下，頗易；創造是逆流而上的，甚難」。[179]顯然，趙並不滿意這種「反動」式的經歷，覺著不能滿足其內心的需求與神學反省。我們可見，他在三十年代開始，愈來愈肯定經驗的重要，他對祈禱及靈修的態度跟從前有了徹然不同的理解。到一九四一年底至四二年初被日軍囚禁時，更從特殊的夢境中，感受到上帝的真實。神秘經歷在其宗教經驗中有著前所未有的作用。然而，他卻

---

[175] 研究宗教經驗的學者指出可留意下列因素：信仰傳統、哲學及社會的處境、心理的狀態等。參 Ralph W. Hood Jr., “Forward,” in ***Handbook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ed. by Ralph W. Hood, Jr (Birmingham: Religious Education Press, 1995), 4-11.

[176] 林榮洪是這種「三期說」的代表，參氏著：《曲高和寡——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第 12 章。

[177] 趙紫宸：《基督教哲學》，自序頁 1。

[178] Peter Berger, ***The Heretical Imperative: Contemporary Possibilities of Religious Affirmation*** (New York: Anchor Press, 1979), Ch. 3-5.

[179] 趙紫宸：〈我的宗教經驗〉（1923），頁 15。

並不僅僅自滿於神秘經驗之中，他指神秘經驗「能領我入涅槃」，但卻「不能幫助我去認識基督」。[180]可見，他雖重視經驗，但卻不接受以經驗取代傳統的作法。

在〈怎樣認識基督〉一文中，趙認爲科學、哲學、道德以至神秘的道路均不能代替「歷史的道路」來幫助人認識基督。意思就是，「在某一個時期中，是基督來表彰上帝，這是歷史的決定性」。人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認識上帝，而是接受上帝的靈的指導。人可生活中來認識基督。[181]後來他語重心長地說：

> **尋求學問，人作得主；尋求上帝，人作不得主，因為上帝不是對象，也不伏在人為的假設的命題之下。對於上帝，人祗有等候，順服，信受，崇仰。因此像施拉馬黑（F. D. E. Schleiermacher），鮑爾（Baur），費爾巴赫（L. Feuerbach）等人不配做神學家；他們都是在墳墓裡找生命的。想從自然裡，人心裡，人心的情感裡，意志裡，理性裡找上帝的，都祗有絕望等待著他們。真正的神學家的出發點是上帝的啟示；上帝的啟示是他熱烈地思慕信受而順服的。但是他不輕看理知，不蔑視學術。**[182]

最後讓趙紫宸在宗教經驗中得到安身立命者，是他順服傳統，重新肯定信仰及教會的權威。中國教會沒有這種宗教本質上的深切覺悟，教義神學就沒有出現的可能。[183]正如筆者指出，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uniqueness）而非「相關性」，才是我們解讀趙氏神學的切入點。[184]

宗教經驗與基督教的社會使命

最後，我們可從趙的宗教經驗中得到啟迪者，是關於個人信仰（內聖）與社會（外王）的關係。

得指出，趙紫宸一直深信基督教在中國社會重建方面扮演著重要而獨特角色。二十年代他企圖通過效法耶穌的人格來完成這項工作，但到三十年代後他顯然已不再堅持這種倫理性的關注，逐漸揚棄「人格救國」的主張了。在抗日戰爭爆發前，趙發表了〈基督教的社會性〉一文，一方面肯定個人得救贖對社會重建的意義，另方面又強調良好的社會環境的重要性。表面看來，這只是重彈個人福音或社會福音的老調，好像了無新意。但實際上，趙卻意圖整合兩者，把個人福音與社會福音視作不可偏廢的兩端。在此，趙嘗試以奧古斯丁「教會之外無救法」的主張作爲參照系。在他心目中，教會就是「社會之內的社會」，「大團體之內的小團體」。「基督教雖然注重個人獨自出於悟徹的經驗，卻依然不遺忘一切經驗是具社會性的」。[185]他指出，教會的工作既是「拯救個人的靈魂」，同時又爲所要拯救的個人，提供相當的社會環境。基督教的「社會性」就是：

> **由拯救個人，建立人格的路徑去對付與解決各種真的社會問題。信眾之中因為有**

---

[180] 趙紫宸：〈怎樣認識基督〉，《天風週刊》，第 102 期（1947 年 12 月 27 日），頁 1 至 2。

[181] 趙紫宸：〈怎樣認識基督〉，頁 2。

[182]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19。

[183]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21。

[184] 邢福增：《尋索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趙紫宸神學論集》。

[185] 趙紫宸：〈基督教的社會性〉，《真理與生命》，第 11 卷 1 期（1937 年 3 月），頁 1 至 2。

> **人不明白，所以還在孜孜矻矻地講出世界的個人福音，而對於社會國家世界各種問題，漠不關心。殊不知這種辦法是違反了基督教的宗旨，埋沒了基督教的本質，毀壞了基督教的精神。同時，另一方面，也有信眾鎮天價鬧著社會改造，經濟革命，而根本忘記了基督教的宗教基礎，人與上帝的聯絡，人與教會的合一。**[186]

質言之，教會是「好社會的先決條件」（sine-qua-non of a good society）。[187]

四十年代中葉以還，趙氏更進一步接受了基督裡的救恩。於是，基督的「新人」成爲其神學思想中一個愈來愈重要的概念。這時，他更把基督內的救恩與教會連接在一起，強調人不能離開教會而獨自使耶穌基督的形象啓現在他生活裡。「教會之外，沒有耶穌基督的真正自一自團的生活」。而教會永不能放棄的使命，就是引人歸向上帝，信從基督，在耶穌基督的生活裡，藉聖靈的恩助，使他們成爲「新人」。[188]

趙深信，在不完整的現實世界裡，「新人」之可能，乃建基於聖經「在基督裡」的真理。人若皈信基督，進入教會，接受洗禮，決志順服上帝的旨意而行，就是與基督同死同活。[189]四十年代，趙紫宸認爲基督教若要「打入中國文化」，中國教會必須培育有熱烈信仰、高超人格的信眾，「將他們送入中國的社會，進於政治教育工商農藝的各界」，讓他們作鹽作光。[190]在趙眼中，這些「新人」是「造出誠信基督，熱烈到猖披。犧牲到癲狂的傑出人才」，[191]即使他們在人數上只佔中國社會的「少數」，但仍可發揮巨大的影響力。[192]如此，我們便能充分理解他在一九四八年撰寫及出版了《基督教的倫理》及《基督徒職業的召命》兩書的背景與關懷。

在《基督教的倫理》一書中，他處理了不同的倫理觀與基督教倫理觀的分別，「基督教的倫理，與他種倫理思想的不同」，在於基督教包蘊著一個「真際」，這就是上帝自己。基督教倫理就是「講服從上帝的旨意，講犧牲功利，講愛人愛真理，愛上帝，而一切以上帝，以上帝的聖愛爲本」。[193]在《基督徒職業的召命》一書中，他進一步呼籲信徒在職業上尋求實踐上帝的旨意，在不同的職業中作光作鹽，並以職業爲「傳揚福音的機會」。同時，他又鼓勵信徒承擔教會事工，強化教會的影響力。[194]我們清楚可見，趙認定，教會在這方面仍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說：

> **教會還是一個滿有同情的親愛家庭，其中存著人還可以算人的雰圍。教會是世界戰爭的精神營壘，入其中，可以避鋒刃，出其境，可以上戰陣。但宗教不是鴉片嗎啡，不僅是避難所。宗教是維護人心，造就人品，保全風節的力量，也是世界上先知的聲音，黑暗中照耀的光明，沉潛迷夢中警醒昏睡的曉鐘。基督教有倫理，**

---

[186] 趙紫宸：〈基督教的社會性（續前）〉，《真理與生命》，第 11 卷 2 期（1937 年 4 月），74 頁 75。

[187] T. C. Chao,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Social and Economic Thought and Action,” in ***Chinese Recorder*** LXIX:7-8 (July-Aug., 1938):346-9.

[188] 趙紫宸：《基督教進解》（上海：青年協會，1947；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5），頁 187 至 189。

[189] 趙紫宸：《基督教教會的意義》（上海：青年協會，1948），頁 10 至 11。

[190]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上海：廣學會，1946），頁 17 至 18。

[191] 趙紫宸：《從中國文化說到基督教》，頁 21。

[192] T. C. Chao, “Christian Witness in China: Where the Church is a Minority in a Non-Christian Environment,” in ***Religious Education Fellowship Bulletin*** 24(1948-1949):4-6.

[193] 趙紫宸：《基督教的倫理》（上海：青年協會，1948），頁 3、5、10。

[194] 趙紫宸：《基督徒職業的召命》（上海：青年協會，1948），頁 17 至 18、31。

> **有教會，必要受逼害，受凌侵，受苦難。然而教會還是創造人生，創造文化的母胎。教會是社會中的社會，文化中的文化，在形式方面是屬地的，是泥土，在精神方面是屬天的，有永遠的勝利。人生不是一剎那，世界不是一時期。世界有山窮而水盡，人生有柳暗與花明。人類到了無法自力更生的時候，世界頹傾，文化衰落，人心必回向上帝，必需求基督教的倫理，必歸入教會。**[195]

我們可以說，趙紫宸在宗教經驗方面的深化與覺悟，使他思考基督教的使命與貢獻時，持定了「基督以外無救法」及「教會以外無救法」的立場，並以此來建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他完全揚棄了昔日倫理式的「效法耶穌」與「人格救國」，而是突顯教會與個人是否能得著真正的宗教經驗。基督教的獨特社會使命，就是通過教會傳揚福音，造就新人，進則作光作鹽，退則保存信仰，激勵信徒。他認定，教會「最中心最偉大最永久，最不能被剝奪的事業」就是宗教本質的工作：將福音講解給有需要福音的人聽，舉行隆重莊嚴的禮拜，將安慰快樂供給人，歸榮耀與上帝與基督耶穌，「以其啓示爲真理的準則，倫理與基礎，價值的保障與人生自我的永恆真實」。中國教會由於加深了自身的宗教信仰與經驗，得著了鞏固的根基，便可在社會及文化上發揮無形的影響。[196]

晚年歲月的宗教經驗

一九七六年，趙紫宸接見到訪的德國神學家古愛華時說：「教會對中國曾有意義與功能，但今天這一切都沒有關係了」。[197]在趙逝世前四個月，他寫信給古氏時又感嘆地說：「我不曾是一個真正的神學家。……我未能負起應該屬於我的擔子」。[198]

趙紫宸不能負起神學家應有的擔子，主要是時代環境不容許他這樣作，關鍵是他個人內心的宗教世界是否仍然持守信仰。如果我們說趙紫宸早年在宗教經驗方面的摸索是獨孤地進行的話，則他在四十年代便把自己置於教會傳統與群體之內，作爲其安身立命的依託，並以教會論來作爲思考問題的基礎。遺憾的是，由於五十年代以還政治運動的衝擊，卻使趙與教會生活脫節。這對他的影響相信是不容忽視的。

早在四十年代末，他在《基督教的倫理》中，語重心長地說：

> **基督徒為聖徒又為國民，又為社會世界的分子，自然要以超權利義務的理想為本，以盡義務得權利為標。在權利盈目，義務當前的時候，至誠的基督徒，雖然曉得基督教的倫理原則上，容許與世周旋，亦當持守精神，多盡義務，少想權利，一切可讓，有當仁不讓的心態與堅毅。譬如利害相形，是非相峙，善惡相對之說，有自由而決擇，無自由而受制。基督徒不幸而居住乎其間，自然祗好作世俗以為道德，基督以為不道德的事情，能決擇，則擇其害之小者，非之微者，惡之細者，以存向善之心，以望救主之助；不能決擇，則自問己心，祈禱上帝，呼籲之餘，則作內心的選擇，或埋頭為奴虜，或殉道得永生。又若存在世上，作了奴隸，成**

[195] 趙紫宸：《基督教的倫理》，頁 35 至 36。
[196] 趙紫宸：〈今後四十年中國基督教教義神學可能的發展〉，頁 20 至 21。
[197] Winfried Glüer, “T. C. Chao and the Quest for Life and Meaning,” in ***China Notes*** XVIII: 4 (Fall 1980): 129.
[198] 古愛華：《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頁 308。

了機器，身不由主，力不從心，則千萬不可灰念傷志，總要與教會相親，存著上帝至終勝利的信仰。

筆者在另文曾說：趙紫宸在五十年代以後，並沒有作出「殉道得永生」的選擇，而是「埋首爲奴隸」，「成了機器，身不由主，力不從心」。他爲了堅守與保存的目的，放下了先知的傳統，屈從於政治壓力之下，選擇「非之微，惡之細」。在他心底裡，上主的拯救卻是遙遙無期，以致他最後亦難免「灰念傷志」。趙紫宸的悲衷在於，當他最需要「與教會相親」的時候，卻是教會受到嚴重摧殘的時候。撇除中國教會的大環境不談，就是趙氏自己多年經營，藉此維繫信仰的小環境，也是無完卵之巢——他目睹自己曾經投入許多心血的燕大基督徒團契，契友如何在三反中投入控訴的行列，愛的團契不堪一擊，就此解散。他又看見宗教學院內自己培裁青年教師及學生在運動後另謀職業，多年心血付諸流水！趙紫宸既與教會脫節，也就難以「存著上帝至終勝利的信仰」了！[199]

關於趙氏晚年心境，現時所能掌握者，均是不同人士與他接觸後留下片言隻語。其中一個廣爲人所關注的問題就是，究竟基督教信仰在趙心中的位置如何？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趙致函予學生駱振芳時透露：

我已三年足跡未出庭戶，因為一天只能走五百步。但是自從去年九月我老伴去世我即讀舊新兩約。新約已全讀畢，舊約已讀到約書亞。要看宗教歷史的過程。無窮世宇都是上帝治理的麼？或是自然進行？[200]

毋庸置疑，童定珍的離世，對趙肯定有極大的打擊。在其結婚六十六週年紀念時，趙曾作詩一首，指六十多年來，妻子與他「也曾同楫共風波」。[201]可以相信，老伴的離開使趙痛失去一位摯愛的親人。際此人生最孤獨的時刻，趙再次閱讀聖經，試圖從宗教信仰中獲取力量。[202]雖然他似乎對「上帝」的治理沒有充份的肯定（「無窮世宇都是上帝治理的麼？或是自然進行？」），但他內心最心深處，仍渴求宗教的實在。九月二十五日，駱振芳在北京探望趙氏，趙向他表示「如果沒有宗教，就是人生如夢；有了宗教，就不同了」，[203]在在反映出他回到宗教的棲息之中。

早在一九五〇年時，他在〈寶貝在瓦器裡〉一文中說：

在外表上，我們與不信的人沒有甚麼分別。但在內心裡，我們若有懇切的祈禱，恆忍的信德，我們就會覺得我們所信的，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真是永生上帝的兒子。我們的外表恐怕永遠是一個瓦器；我們的責任是不要放走這瓦器裡的寶

---

[199] 邢福增：〈趙紫宸的教會論——兼論其在中共建國後的教會改革觀〉，頁 224 至 226。

[200] 駱振芳：〈趙紫宸博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金陵協和神學誌》（海外版），復第 3 期（1985 年 12 月），頁 34。

[201] 趙紫宸：〈結褵六十六週年〉，趙蘿蕤輯：〈趙紫宸晚年詩詞選〉，《文史資料選輯》，第 14 輯（北京：1982），頁 168。原詩爲「六十六年駒隙過，也曾同楫共風波，肩頭父祖遺傳債，耳畔兒童學唱歌。夫寫文章終碌碌，妻勤針黹漸皤皤，今朝飲啄携孫女，烤鴨香脂笑樂多。」趙於一九〇五年結婚，六十六年應爲一九七一年。

[202] 他在一九七四年致函予吳芷芳時，曾提及他所讀的《紅旗》、《學習與批判》、《人民日報》、《參考消息》等，均「不能解決我的要求」。他又提及自己正在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哥達綱領批判》、《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書，惟「頭腦子不夠玄奧，往往停滯難進」。參〈趙紫宸與吳芷芳書〉，《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頁 90 至 91。

[203] 駱振芳：〈回憶趙紫宸老師和我最後一次見面〉，《天風》，1986 年 12 月，頁 21。

> 貝。我們若有這寶貝在我們的瓦器裡，就當凡事謹慎，凡事無怨無憎，凡事有希望。在今日中國的社會裡，我們好像不能發生什麼作用，既不能在制度的改革上發生效率，復不能在流行思想上引起變化。中國的社會好像再也用不著我們與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了。……教會若立刻倒塌了，國家在表面上也見不到什麼虧闕。但是我們知道時候要到，人人豐衣足食，諸欲俱達，人必要問人活著是為什麼的，人的價值，意義，歸宿是什麼，人有沒有真實性，世界有沒有歸宿，真理以什麼為標準，道德以什麼為根基。豐衣足食，知識滿溢之人，必要經驗到自我的孤單，人生的空虛。那時候，我們方纔有機會揭開我們的瓦器，將寶貝彰顯出來。我們今日的責任是堅守，是保全，是潛伏著的發展。[204]

筆者相信，人生歲月走到盡頭的趙紫宸，充份經驗到自我的孤單，人生的空虛。面對人活著的意義這個終極的問題，他實在難以找到任何合理的答案，最後他揭開「瓦器」，面對「寶貝」，並且在其中獲得心靈與靈魂的安息。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一日，趙紫宸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九十一歲。雖然他在離開世界時，已無法承擔一位神學家應有的責任與使命，但最終他仍能回到信仰中，實證出信仰的意義與價值。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對信仰的尋索與追求，對於今天中國神學的發展，仍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204] 趙紫宸：〈寶貝放在瓦器裡〉，《真理與生命》，第 15 卷 3 期（1950 年 9 月），頁 9。